THE OBSERVER

觀察

逢一、十六出版 · 一九五〇年五月一日 · 每份售二千五百元

第六卷 第十三期

專論

論物價穩定後工業經營遭遇的新困難及其克服道路 鄭伯彬

新婚姻法建立了新的男女關係 芮沐

闡論中國奴隸社會的一件史料 趙儷生

美國未成年勞動者的失業問題 易夢虹

五四紀念

李大釗與五四運動 金毓黻

從文化觀點上回首五四 楊振聲

報告

舉辦了一次新型展覽會的經驗 袁翰青

思想與生活

挖出我的思想根源 雲映海

清華是怎樣進行學習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的? 謝逢我

觀察通信

記半年來全國各項產業工代會的召開 觀察記者

記河南農村的土地改革 穆家軍

記松江省農村副業生產工作 胡冰

上海科學工作者的新方向 左步青

人物及事業

李四光教授及其在地質學上的成就 徐盈

國立北京圖書館藏

（上接第二十六頁）副業和製造目前農村用具。同時要推廣訂合同辦法，製訂冬閑、掛鉤兩期的生產計劃，加強組織領導，以貫徹副業生產的計劃性。今年各種副業生產的計劃量如下：

蜂蜜　十九萬斤
麥尾　二十八萬斤
蛋　一億個
雞　七百八十二萬隻
豬　一百五十六萬口
（要爭取一九五一年全省每人平均兩隻雞，每戶平均兩口豬）
亞麻　六千八百廿噸
甜菜　一百五十萬噸
蘇麻子油　十四萬斤
木材　二百二十萬立米
植樹　九百二十萬株
育苗　二千一百四十七萬株
毛皮　二十五萬張
水產　九千九百噸
（松江省的特產大麻哈魚，偽滿時最高年產量二十五萬條，約一百五十萬斤。今年計劃增產四十萬條，約二百萬斤。）

這個生產任務是相當重大的，但是看到各地農民代表們在全省第一屆人民代表會議上，對今年大生產運動的熱情和信心，我們相信這個光榮的任務是會勝利完成的！

農村副業生產的新階段

三月二十五日，與松江省第一屆人民代表會議同時在哈爾濱揭幕的農村副業展覽會，是松江省農村副業生產工作的一個新的標誌。這個展覽會，是由松、哈省市商業廳、商業局、土產公司、農學院、合作社、文協等十餘單位，經過三個月的籌備而舉辦的。這個展覽會不僅是單純的陳列或展覽，它好像一個「研究技術」「介紹供銷」「城鄉聯繫」的機構，也像是一個學校。它的目的就是指導農村副業生產，介紹副業資源和開闢銷路。展覽會搜集了有關工業原料、藥材、畜產、編織品、優良種子、林業、山貨、毛皮、水產和新舊農具等方面的產品與材料，通過實物、圖畫、圖表、照片、標本模型等種種形式，用好壞對比，實際生動的表現方法，就各種副業的生產方法，規格質量和產品銷路等加以說明。對於農村生產技術的改進，生產方式的互助合作，飼養栽培方法的逐漸科學化，提高質量，以及在推銷上開闢途徑等方面，都作了具體的介紹。

展覽會開幕後，在短短的一星期內，參觀者即達一萬一千餘人，其中以職工、農民和學生佔大多數。正在開會的省人民代表們，在開幕的第一天就去參觀。許多農民代表用心地記下一些新的生產方法，他們說：「這可得回去告訴大伙！」代表郭衞聽到說明員講了養豬的新方法以後，高興地說：「這趕上請了一位先生！」有些代表仔細地琢磨着改良農具，他們看到熊岳改良耧耙，比舊式耧耙省三人工不算，一天還多出一半的活，都覺得這傢什好，準備回去號召大家使用改良農具。

通過這個展覽會，不僅啓示了城鄉各階層的人民，在研究農村副業生產供銷問題上，應該做好那些工作；而且向廣大農民介紹了許多新的生產方法和經驗，這對於松江省農村副業生產工作的改進和提高，是有很大作用的。

伴隨着大生產運動的展開，松江省的農村副業生產工作，將走向一個新的發展階段。農村副業展覽會，就是它的鮮明的標誌！

一九五〇、四、十五，於哈爾濱。

（上接第二十七頁）蔓延於三野駐滬郊個別部隊，上海市的醫師、護士、化驗、醫藥人員及同濟、聖約翰、震旦、上醫、同德等醫護學校高班學生，響應號召，動員了大批人員下鄉參加治療工作。日本住血吸蟲病在醫學上是個重大問題，這次動員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作較有系統的大規模研究和治療，並展開預防和宣傳工作，三個月中，治療工作獲得極大的成就，使病員恢復了健康，並提高了部隊的衛生常識，使部隊中衛生人員與上海醫務工作者交流經驗。由於下鄉人員體驗到解放軍戰士艱苦樸實的作風與生活，更進而與他們在思想和情感上打成一片，下鄉人員在治療運動中立了功的有二百二十七人。四月十一日舉行的慶功大會上由某兵團宋時輪司令員當場給予獎狀，評功委員會並決定在大會上特別表揚顧福慶、朱恒驄、應光岳等認真負責的工作態度。

元旦日在上海跑馬廳揭幕的華東區第一次農業展覽會，是中國農業科學研究社和華東區農林水利部、上海市近郊農民協會籌委會發起的，饒主席在開幕詞中指出：「勞動農民的經驗、科學的理論知識和政府的領導，三者必須結合起來纔有力量」。這次大會之所以獲得成就，恰恰由於這三者結合了。在人民政府的領導下，在華東軍政首長的關切指導和鼓勵下，有了百餘科學文化團體的參加，百餘位專家的動手和數千科學工作者與知識分子、勞動農民英雄和各省區從事實際工作的同志參加，他們帶來實際生產經驗和生產成果，三者結合，研究一番，展覽出來，自然可以作出成績。

這次農展的規模是空前的，展出共分十部：農業建設途徑、農藝、病蟲藥械、園藝、土壤肥料、紡織纖維、農業工程、水產、林牧等，並包括各種圖表七一九種，照片一〇七八張、標本二六五九種、實物一一七二件、器械五〇八套、模型二二六座、解釋表五一張。竹棚長約三里，佔用跑馬廳場地一九〇市畝。這也是農業科學工作者史無前例的大團結。過去對於搞農業科學的人大家總覺得很保守，甚至很孤僻，彼此間極少聯繫，可是在農展會上，白髮的老學者，年青的農科學生，大家都起勁地工作在一道，有的人剛剛在為羣衆講解，回頭就去向人家請教，晚上愉快地參加小組會、做筆記，有的人藉這樣難得的機會，老遠從鄉下跑來，一面參加工作，一面今天跟這個討論中棉田改種美棉的問題，明天同那個研究病害蟲的防治法，後天又去打聽什麼中耕器最便宜最好用。

整個農展是成功的。展出期中，曾舉行了農業科學工作者和農民代表的座談會，不可否認的是「過去農業無科學，勞動農民憑藉經驗摸索，我們雖不根本否認農民們累積的經驗，但如果用現代化的農業科學和技術，結合過去的經驗，一定能創造更好的成績來，這些問題通過這次農展，已為今後農業生產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本年度中國農業科學研究社年會上，也提出了面向農村的任務。

（四）國際主義的溫暖

（為紀念偉大的俄羅斯學者，世界著名生理學的學術領袖伊凡・巴甫洛夫百年誕辰，科協上海分會和中蘇友協上海分會於去年九月二十六、七兩日舉行晚會和學術演講會。巴夫洛夫站在唯物論的立場，認為心理現象不過是物質運動的一種，精神與肉體是不可分的整體。早在一九三二年國際生理學會上他就曾說：我相信不久以後，人類思想的重要階段就要到來，那時生理學和心理學，客觀與主觀，將要真正合流，意識和肉體中間的矛盾和對立將要得到徹底解決，或者竟自然消滅。這是多麼偉大的預見！

在這偉大的時代裏，科學工作者也感受到國際主義的溫暖，蘇聯文化藝術科學工作者代表團來滬，團員阿格拉則博士演講關於蘇聯科學院組織及一般科學情況，斯托列托夫博士演講關於米邱林生物學說，及至最近成立的米邱林學會和努日金博士來滬多次講學，使上海學術界人士獲得這一學說的要義，除了在生物學和農業科學上有不朽的貢獻外，在教育學上也有極大的影響，即是：人民的優秀品格將在教育影響下培養起來，這傳 （下接第廿四頁）

觀察

第六卷 第十三期

1950. 5. 1.

發行者：觀察社

社址：北京(25)交道口大街北吉祥胡同二號
電話：(4)一一九六號
電報掛號：六〇三四

定閱：三個月六期一萬五千元
半年十二期三萬元

稿費：每千字致送人民幣二萬至二萬五千元，于發表後三日內送出。

本期作者

鄭伯彬：人民銀行總行業務處專門委員
芮　沐：北京大學法律系教授
趙儷生：中國科學院編譯
易夢虹：人民銀行總行計劃處研究員
金毓黻：北京大學史學系教授
楊振聲：北大中國文學系教授
袁翰青：文化部科學普及局局長
裴映綸：清華大學學生
謝逢我：清華大學學生
胡　冰：在哈爾濱教育局工作
左步青：上海大公報記者
徐　盈：天津進步日報主筆

論物價穩定後工業經營遭遇的新困難及其克服道路

鄭伯彬

（一）新的經濟局勢

陳雲副總理四月十三日的財政報告，指出了「近四個月，國家的財政情況已有好轉」。好轉的基本因素是：秋徵公糧百分之七十已經入倉；解放較早的地區，稅收在逐步增加；今年第一期公債已實收百分之七十二；全國公教人員的編制尚未超過概算所列數目，並且還可酌量減少；因此，從三月份算起，財政赤字已不成什麼問題，「平均算來，可以接近平衡」，「由於財政收支所需的增發鈔票，可以減到極小限度，全國金融物價就可以開始好轉」。

這個報告一點也不誇張的坦白說明了今天的經濟局勢。假使我們再研究一下三月三日頒布「關於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以後的政府措施：在財政方面力爭收支平衡，厲行節約，全國稅收統一調度使用；物資方面使調度靈活，國營貿易機關有計劃的供售物資，回籠通貨；在金融方面更實行現金管理制度，集中一切可能集中的資金；就可以想到最近二月來的物價穩落局面，不是一種偶然現象，它是政府決心扭轉十幾年來通貨膨脹的初步效果，一個正常的經濟新局面開始到來的表現。

在戰爭還沒有完全結束，財政收支還沒有完全平衡的今天，這自然是一場經濟上的偉大戰役。但是，正好像過去許多軍事上的戰役一樣，由於財經部門一連串的各種會議，精打細算，完全瞭解了全國的實況，這個經濟戰役也是必操勝算的。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今後在中國財經史上即將展開新頁，這新頁要告訴我們：即將面臨一個全新的經濟局面，十幾年來的通貨膨脹將成為過去的史實，像去年那樣的物價大波動從此消除：今後的經濟生活將逐漸正常化；國民經濟將安置在堅實牢固的基礎上，並在牢固的基礎上，逐漸穩步發展。這些情形，也正是符合廣大人民的長久希望和國家的經濟需要的。我們相信沒有人不歡迎這個新的局面。

但是，我們也不能否認，在這個轉變過程中，由於長期通貨膨脹的習慣經營，工商業——特別是工業，可能遭遇到許多新的困難。不過，這些因物價穩定或下跌而引起的新困難，是決不應該影響既定政策的執行的。

（二）工業經營上遭遇的新問題

在這個貨幣價值日漸穩定的新時期內，工業界可能遭遇到什麼困難呢？根據這將近二月的物價穩定所已經表現的工業經營上的新問題，至少有下列三方面：

第一是銷路阻滯。二月以來，無論是天津、上海、漢口、廣州、西安、從北到南、從東到西的都市，商品市場上普遍出現供多求少的狀態。像上海，這個擁有五百多萬人口而一向以投機著稱的大都市，更創造了市場成交量的空前未有的最低紀錄。在三月下旬的幾天內，上海米市場的最低成交量，一天只有一千餘担，紗布市場上的棉紗成交量只達數件，這真是一額空前的「奇蹟」。上海市場的情況可能有轟炸的因素在內，但是在天津和北京的糧食市場上，我們可以看到許多戰前的麵粉。這個事實足夠說明，在貨幣穩定的時候，囤積家已在吐售多年積存的物資。並且，由這個事實我們更可瞭解，由於貨幣的穩定，實銷以外的銷售既感困難，而工廠成品的銷路還要被過去的囤貨所奪。只有等到市場上所擁塞的囤貨大致消發以後，工廠出品的銷路才有大量打開的可能。

第二是有些工廠已逐漸感到流通資金的週轉困難，這是銷路阻滯的必然結果。又因為利率升降的惰性，利息還不能及時降低，接收行莊貸放的工廠，更感利息高昂的重負。這種情形普遍發生於中小工廠，他們的資金力量一向是不太雄厚的

。但當我們仔細分析的時候，這種現象的形成，雖然是由於銷路阻滯的原故，而更重要的基本原因，還是因為他們過多的積存了原料和材料，因為過去習慣於通貨膨脹的經營方法，把生產時間過份延長的原故。

第三是超額利潤的消滅難於維持他們未能一時減低的開支。許多工廠習慣於過去的超額利潤，業務計劃（雖然他們實際上並沒有任何計劃）是以過份利得的預計為基礎的。在過去，積存原材料即可獲致大量的利潤，十幾年來的經驗，使他們把這部分的利得作為應有的收入。今天積存原材料沒有任何好處，就使他們對於一時不能降低的開支無從找到源流了。

這些問題實際上都是在物價穩定的過程中產生的。假使是一個比較健全的企業，這類由於物價穩定或下降所遭遇到的困難，「咬咬牙關就過去了」，但不幸的是，解放以後的工業大部分還沒有完全達成他們應有的轉變任務，這次物價的突轉穩定，本出一般人的意外，使他們有點感到「措手不及」（天津某廠之語）！

解放一年多以來，各地工業雖然開始了好的轉變：例如天津的工業為着擺脫帝國主義的倚賴，製造了代替品一百餘種；津滬青穗的工業也在轉變生產方針面向農村；但當我們分析一下解放以後的工業情況，仍然可以發現留存了不少的弱點：

首先就是轉變的不充分，許多工廠都是在他機械設備的可能轉變的範圍內改變比較應時的產品，例如高級呢絨廠改製粗呢、工業用呢或麻袋，汽水釀酒等業改製醬油，製香之改製蚊烟等，這種轉變有些是增加了生產成本，有些是降低了效率，更有些是引起了新產品的新的產銷問題，例如醬油的生產過剩或蚊烟的非時令所需等現象。

其次是解放以後的工業生產還表現有或多或少的盲目性，許多產業家缺乏比較遠大的眼光，為眼前的利潤所惑；根據一時或不正常的供求情況決定他的生產方針。一個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去年保護關稅政策限制染料的進口，天津的染料業即盲目的超速的發展，到了今年的二三月進入染料的淡季的時候，一半以上的小廠又不能不被迫停工了。

第三，也是最普遍的現象，就是解放以後的物價規律在基本上已不同以前，各業直至最近仍不能正確把握他的營業採算。在過去國民黨時代，他們很容易找到行市的升降規律，解放以後由於國營經濟比重的增大，國家對市場的控制力隨之加強，就使他們的投機經營，有時要遭受虧損。為着獲得高額利潤的原故，許多工業就利用更「穩健的」辦法，長期積存原料或產品，希圖二三月以後的物價上昇的利益，並且，這部份的利潤經常在他們的營業採算上佔着很重要的位置。

因為解放以後的工業或多或少的還是保留了以上的性質，所以，物價一旦穩定或輕微下降，工業方面乃不免發生新的困難，雖然在基本上沒有人否認物價穩定對於工商業的好處，但是因為過去的發展太不健全，解放以後的轉變還不充分，所以大家都感到有些「措手不及」了。

（二）搞通思想·改變做法

目前的工業界不但要更積極的擺脫帝國主義的依賴，徹底的轉變方向而向農村，而且，更重要的，還要堅決的健全組織，把工業安置在正常的經濟基礎上，迎接即將到來的新的經濟局面。過去的一套在通貨膨脹下的一切做法，是必須立即放棄了。

怎樣適合新的經濟環境，使企業能夠在正常的經濟基礎上發展呢？我們認為目前工業界本身可以完成和必須完成的首要任務，是儘量減低成本和加速資金的週轉。

在通貨膨脹期中，工業界是不太講究生產效率的。原料的浪費，燃料和電力的損失，機器的空閑，人員的浮濫，都可以由通貨膨脹的利益沖銷，因機器空閑而延長的生產時間，還可以加大物價上昇的利潤。在物價穩定的時候，企業利潤的來源只有依靠生產過程才能得到，企業家就必需開始和上述的一切浪費作堅決鬥爭，堅決完成降低生產成本的任務。

資本主義社會減低成本的主要來源是依靠降低勞動者的工資水準和工人物質生活的日趨貧困；今天在新民主主義的社會裏，却不能從這方面着手。除此之外，有什麼方法降低成本呢？顯然的，我們還可以從每一單位所需原料材料及勞動時間的節約上着手。例如減少廢品，減低每一單位產品所需原料及材料的定額；變更原定的標準成品的標造，使原材料達到最經濟的使用；進而利用廢品，利用其他原料以代替價昂的原料；加強機器設備的能力，使用電熱及動力充分利用；合理安排製造程序，減低勞力的損耗，和管理費用的節約等，都是降低成本的一連串的方法。只要企業家一心一意的從事生產，在生產過程中減少和消除一切的浪費，即使工資有所增加，成本還是可以降低的。

但是，僅僅降低成本還不能完全解決問題，工業界在目前除了和浪費作堅決鬥爭以外，還得更進一步的和囤積思想作堅決鬥爭。這就是加速資金週轉。

加速資金週轉的一個最便當的方法，自然是「機械化」和實施連續生產制（皮帶制度），這在目前資金缺乏的時候，是不可能完成的；但是，除此之外，我們還是可以減少倉庫中的商品原料及其他物資的儲備，因為囤積材料產品，或只要是儲存超過了需要量，都是可能使資金週轉因之遲滯的。此外減少未完成品的積存，也是加速資金週轉率的主要因素。在流動資金循環交替的這一環節中，只要稍微注意，就可以發現存在極廣泛的，加速資金週轉的可能性。在物價下跌的過程中，雖然可能影響這些方法的進行，但若能結合成本的下降。和對推銷的努力，是可以完全克服的，主要的是企業家必須首先拋棄在通貨膨脹期中養成的囤積致富的思想。

中央人民政府在通過和批准陳雲副總理的財政報告的時候，又指出了今後幾個月內財經工作的重點，是調整公營企業與私營企業及公私各個部門的相互關係。在政府的調整過程中，如能更充分的注意各業間的良好配合，公私雙方共同組成一個獨立自主的工業有機體，我們相信，在公私雙方的努力下，必能使工業迅速渡過這一最後的難關，在健全的經濟基礎上發揚光大！

新婚姻法建立了新的男女關係

芮沐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這次通過並公佈了嶄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婚姻法。這是我們新民主主義階段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立法。這個婚姻法的頒佈，關係到全國一切的男女，牽涉到他們一生的幸福。婚姻制度的改革，在社會改革的工作中是具有特殊意義的。中國人民政協綱領第六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廢除束縛婦女的封建制度，婦女在政治的、經濟的、文化教育的、社會的、生活各方面，均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實行男女婚姻自由。」共同綱領的大方針放在我們的面前，現在婚姻法的頒佈把它具體化了。

這個婚姻法不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第一個大法，而且也是新民主主義社會建設的關於男女問題總方向的一個統一啓示。它具體地做了推翻封建的工作，還反映着新的生產關係的實際內容，它從封建的剝削中解放了佔有全國人民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一半的偉大的生產力——婦女。它不僅在形式上和以往的一切婚姻法有莫大的差別，而且在實質上也顯示了完全進步的趨向。它的不同點在那裏呢？我們可分下面幾方面來講：

（一）關於原則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在第一條內奠定了婚姻制度的基本原則。那第一條說：「我們廢除包辦強迫、男尊女卑、漠視子女利益的封建主義婚姻制度，實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權利平等、保護婦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義婚姻制度。」這個規定很明顯地確定了我們的任務。中國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大政策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但是具體步驟怎樣做法呢？顯然，推翻舊的婚姻制度就是其中一個顯著的任務。

舊中國的婚姻制度是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的基層細胞，它是舊家族制度的最重要的一環。舊家族制度是封建社會剝削關係的中心站，因而封建社會就依靠着它，作爲整個社會建築的磐石，但是封建的家族制度卻又依靠着封建的婚姻制度來完成它的連繫。這幾個因素彼此密結起來，構成一個完整的社會體系，要推翻其全部分，就必須推翻其各個組成部分，它的各個組成部分之推翻，也就在毀滅它整個的建築。

毛主席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裡面指出：中國男子要受三種有系統的權力支配，這就是封建主義的政權族權和神權，而中國的婦女，除受着這三種權的支配之外，還受着封建主義的夫權的支配。這四種權力代表了全部封建家法制度的威力，而其中夫權則又是封建宗法制度男女關係方面及家庭關係方面所提示、集中表現。舊的封建勢力具體地發揮其壓迫力量於婚姻關係的有：包辦、強迫、買賣、早婚、重婚、納妾、童養媳、以及翁姑丈夫的虐待等現象。在沒有推翻這種封建的原則和具體事實之前，我們不能想像能夠做到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的實施，我們也無從談到眞正的一夫一妻制。只有廢除了封建，我們才有建立新男女關係的把握。所以新婚姻法一方面樹立了去舊建新的原則，一方面又具體地禁絕了各種封建婚姻制度的弊害，這和以往的婚姻法眞有天壤的區別。

國民黨反動政府的婚姻法受着殖民地思想的支配，祇知道把資本主義的一套「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囫圇吞棗地搬了過來，妄想在原有的階級關係上凌空地架起幾個以另一種事實爲背景的立法建築，這是謬誤的。結果，封建還走着封建的道路，條文依然是堂皇的條文。所以國民黨的婚姻法從來就沒有成長到中國的農村中去。固然，在中國過去的婚姻裏也不容易找到建築在愛情上的歷史，但這是爲什麼呢？

男女沒有平等和自由，彼此間的關係不能從愛情出發是明顯的事，而且建築在基本上不平等階級立場的婚姻，我們也不能希望平等和自由之實現的。男女的平等和自由和任何其他意識形態一般，必須有物質的基礎作其內容。在舊的社會基礎上，新的自由平等不克生長，是不需要多予解說的道理。所以就這個觀點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它和國民黨反動派的尾巴主義的買辦性的婚姻法，是走着兩個絕不相同世界的道路。我們的婚姻法是和整個革命總方向配合着的。

（二）從原則性之不同，我們又可以看到其他許多具體處理方法之不同；例如關於結婚，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除了需要男女雙方完全自願動作以外，就沒有提出其他的要求。我們禁止任何人藉婚姻來索取財物或敲詐畧誘，我們不提倡增加結婚雙方經濟負担的繁重儀式，我們不給買賣婚姻在任何形式下透露到事實水面的機會。我們簡單地祇要求結婚當事人到所在地的人民政府去登記，人民政府發給了登記證，婚姻也就此完成。

不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也提出了一些消極的限制。例如年歲太幼的不能結婚，血統關係太近的，生理缺陷的，患花柳病痲瘋病等認爲不應結婚的，都不能結婚。但這種限制幾乎是每個中國老百姓所能了解而自己自然會注意的事情，決不像反動派政府的親屬法一樣，徒然樹立了條款，事實上卻放開了後門，結婚的儀式等於虛設，重婚和通姦的現象一天天增多，又加上一套「效」「撤銷」的洋把戲，點綴花巧，實際上祇有弊害，無一些是處的。

（三）但是我們的婚姻法如果提出了婚姻自由而沒有離婚的自由與之配合，這個男女自由和平等的目的還是不能貫澈的。新婚姻法基本上既然認愛情爲男女結合的唯一聯繫，那麼沒有離婚的自由，這男女關係最純正的橋樑——愛情——也就不能架起來。根據一部分不十分完全的統計，各地法院百分之四十到九十以上的民事離婚案件，竟有百分之五十到九十是出於女方的請求，由此一點

，可知在封建婚姻制度壓迫下的中國婦女是何等地迫切在設法從舊社會的樊籠中脫離出來。我們也更可以知道，離婚自由，就女子而言，是怎樣沉重的一個要求了。這部分統計材料是可靠的，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十七條規定，雙方離婚准予離婚和單方要求離婚也准予離婚的辦法，決不致於發生一般人所想像的婚姻無政府狀態。婚姻法主要目的是推翻束縛婦女的封建枷鎖，如果沒有堅強的替婦女造成自由之路的保證，那末所謂婚姻自由就成爲單純的騙局。在這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中，我們沒有像國民黨親屬法一般，用予取予奪的方法，一面標榜自由平等，一面卻設立一連串有限制性的離婚條件，更設立了所謂兩願離婚的制度。我們試爲處於被壓迫重担下的幾萬萬中國婦女設想吧，若要她們從具有階級統治基礎的男子對方手裏討出人身的自由來，顯然是無上困難的事。

當然，離婚是嚴重的遭遇。新民主主義社會並不希望男女對於他們終身的關係，採取一種輕舉玩忽的態度。所以在離婚的手續上，不免要設置一部分穩重的調解和登記的辦法。但在基本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對於離婚一端，確沒有提出任何條件來。

（四）不過在離婚之後又如何處理男女之間的關係呢？據恩格斯的分析，在社會的演變中，婦女所以降至今日的地位，這是她把社會生產中所據有的方隅讓給他丈夫以後的必然結果。私有財產的發展，和家庭男女的分工，使丈夫取得了勞動工具和生產物之所有權。丈夫就變成有產者，妻則成爲無產者，所以男子在家中張羅了一切管理權。母權制變爲父權制，婦女於是也就成爲家庭服役者。又因爲處理家事的緣故，女子也就喪失了她的社會作用，以致最後完全脫離了社會生產。在這種情況下，社會的婚姻關係一定反映爲階級的婚姻關係，有產者之一方也必然能爭得締結婚姻的支配權，所以財產的動機就影響到婚姻關係中之配偶選擇。

顯然，女子喪失其歷史上的策略重心，不能參加社會生產過程的兩端，無疑是男女不平等與婚姻關係中封建制度大部分事實的決定因素，女子要從舊社會解放出來，唯一的出路於爭取社會生產勞動之參加，與減輕自己關於子女扶養的負担。在這方面，全國的土改工作替新婚姻法建立了一個鞏固的物質基礎。同時在婚姻法本身裏，我們又奠定了一個偏向女子和子女有利的良好的上層建築。毛主席說，矯枉必須過正。我們也認爲，依目前的實際情況出發，祇有拿偏利於婦女和子女之不平等底平衡，才能抵銷原有的不平衡而取得男女間最後的眞正平衡。男女平等固是我們理應爭取的最終目標，但我們也必須肯定男女已經不平等的事實始終是存在着的。

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老實說，是已經非常明確地反映了它們的階級背景。祇須我們眼光銳利，我們就能透視它們的精微的幕籬。資本主義國家因爲站在純經濟的立場，所以法律也必須把夫妻間的財產關係弄成機械般的正確，這和商品利潤折算間必須把尖銳對立的利害衝突弄清楚正確完全一樣。在這種立法下，夫婦關係是用訴訟中原被告觀點來訂立的。這種法律儘管平面地設置了許多財產制度，聽人選擇，但左右不過是「合夥契約」的清算。爲兩性間人爲地造成一種自私的經濟壁壘，這是夫妻財產關係中最耀眼的企圖。兩性的鬭爭象徵了社會上一般的經濟鬭爭。簡單地說，資產階級的夫妻財產制是建築在男女的資產的矛盾上的，因此是離心的而不是合作的，是反動的而不是積極的，是維持夫婦兩方的階級背景，而不是在消除階級矛盾，以領導兩性互助向建設方向走的。資產階級的財產制只有更刺激了婚姻的經濟動機，因此也把男女關係更深度地商品化。

（五）最後，我們可以順便談一談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在立法過程中的優異表現。這新婚姻法看來好像很快地頒佈了，其實却是積累了幾乎二十餘年在革命領導下婚姻問題上的經驗，總結了各地區十幾個已施行的婚姻條例纔最後成功的。即以這末一階段的起草過程說，其中也經過了一年半的準備，搜集了無量數的各地司法判例、統計材料、總結報告，經過了大小九十次會議的討論，並參考了前進友邦的法律，在批判資產階級婚姻的觀點下，始克提出一個比較可用的草案面目。最後還經過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修改，乃克公佈於全民。其步驟的踏實，和瞭解實際情況的努力，是特別應該提出作爲表揚的。

新婚姻法裏廢掉了一大套老百姓無法瞭解的舶來品的婚姻技巧，用着最純樸簡易的語句表達了幾個非常明確嚴正的大方針。婚姻法原則性的揭示佔據着婚姻法爲首的兩條條文，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事。我們不是平白地講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我們認清楚，僅在推翻封建的前提之下，才同時能完成新男女關係的建立。國民黨反動派政府的親屬法有一百七十一條條文，就以婚姻本身而論，也有八十六條，相對於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的廿七條，包括了婚姻和父母子女各方面的措置，後者之優良品質是非常明顯的。不過我們這樣把它們比較，必須說明是十分不倫不類的事，階級立場絕然不同的兩個制度，風馬牛不相及，在基礎上是距離得如此遙的。

再次就新婚姻法應用的方法來論，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是唯物的辯證的。在這婚姻法裏，我們不能站在片面的立場去看問題，例如去追問爲什麼我們偏重保護女性，前面已經講過。我們不能憑空的推論，准許單方離婚就會使男子佔了便宜。我們不能祇見到形式，就懷疑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提倡「夫妻互敬互愛、互相幫助，和睦團結」僅是老生長談，裝門面的口號。我們瞭解新婚姻法的眞正精神，祇有用社會發展的觀點，才能掌握其原則的全面性。我們必須認清舊的生產關係被推翻了，新的動力才能逐步地發展。夫婦互助互愛、積極生產，是封建制度消滅後的當然現象，知其所以然，才能知其必然。

無疑的，中國社會重要的一部分生產力是必須被解放出來的，這是我們革命任務之一。新婚姻法是中國人民革命的成果，所以也只有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正確領導之下，纔能想像這樣一個進步的革命的婚姻法在今日之出現。隨着這新婚姻法的頒佈，婦女和男子一般地可以解除了他們在思想上的束縛，和物質上的壓迫。新型女性和模範丈夫的產生是可以期待的。

閒論中國奴隸社會的一件史料

趙儷生

一、引言

近來學習「社會發展簡史」或「政治經濟學」第二章的同志們，往往有一種要求，希望能有人把人類社會發展劃分階段的學說與中國具體的史料結合起來，做一番類乎「中國的社會發展簡史」的大報告。這要求自然是好的，因為這說明大家對於人類歷史的一般性有了瞭解之後，復對於中華民族的歷史發展的特具情況，要求作進一步的追尋。但在目前，由於過去蔣統時期馬列主義的研究遭受殘酷的鎮壓，舊有的歷史學和考古學的研究在方法上又存在着嚴重的局限性，致使直到今天歷史學的既有成就並不太大，因而現在似乎也還沒有誰能在這一方面做出「定說」。又有人說，「假如只讀列昂節夫的書，最多也不過是懂得了俄國的社會發展史或歐洲的社會發展史」。這說法則有問題了。因為牠顯然是忽略或排斥了人類歷史發展的一般性，而特別強調了中國的特殊性。列昂節夫的書是完全按照馬、恩、列、斯的歷史唯物主義原則寫的，而那些原則又絕非馬、恩、列、斯的向壁虛構，而是對全部人類生活實踐做了思考、總和、和抽象的結果。因此，這些原則是不僅可以概括俄國或歐洲，牠是「證諸四海而皆準」的。在原則的一方面是如此。至於原則以外的，那就未必能和中國的具體情況完全吻合。例如列昂節夫的書上說，「隨着冶鐵術和書契的發明以後，原始社會時期就告結束，而文明時代便從此開始」，這句話在中國就很難具體運用，因為書契的發明，據目前考古方面最早的記錄，是大約在傳說中的夏末或是殷初，還有城子崖黑陶上的「六魚一小龜」等字樣可以做根據；至於冶鐵術的發明在何時，則沒有人知道，我們只知道青銅器之廢與鐵器之興是在戰國到秦楚之際。那麼，我們將根據什麼來判斷中華民族從原始社會進入文明時代的確實年代與具體情況呢？這還須等待田野方面更多的發掘與理論方面更多的引伸。再例如，列昂節夫的書上又說「國內的戰爭與奴隸暴動都動搖了奴隸制度，並且造成了奴隸制度滅亡的基本因素。」在希臘，牠有斯巴達事件的顯明例証。但在中國，奴隸暴動的史實是什麼？殷末牧野之戰前途倒戈的「億兆夷人」是不是奴隸暴動？假如是，牠為什麼沒有顛覆或削弱了奴隸制，而只顛覆了殷王朝？再如陳涉、吳廣、赤眉、銅馬、綠林、和甚至黃巾的暴動，究竟是農民暴動還是奴隸暴動？這些問題與中國奴隸社會究竟截止於何時進入封建制的問題有極密切的關係。然而目前國內國外的史學家們對此亦尚意見紛歧，而未能定於一。因此，把馬列主義的、亦即歷史唯物主義的一般性的原則與中國具體史蹟中所包含的複雜的特殊情況，拿來兩相結合，使其統一，這是完全必要的，因為牠將是對馬列主義的一種豐富。但在目前，此事則尚難一蹴而就。目前，我們只能從一點一滴做起。例如前幾天，郭子衡（寶鈞）先生提供了他從前發掘殷墟墓葬的簡述，而郭沫若先生又即刻把這一發掘材料和馬列主義原則結合起來，這對中國奴隸社會的知識，是大大增進了的。（有關文章見本年三月十九日光明日報『學術』第二期、同月二十一日「光明日報」、「新華月報」四月號、和新版「十批判書」的「改版斷記」）現在，郭子衡先生又到安陽發掘去了。不久，新的材料的獲得，與新的理論的推廣與引伸，是指日可期的。而且不僅限於考古。即對古代神話傳說的再建，對古文獻如尚書、詩、周易等的整理，以及對甲骨和青銅器的繼續研究上，也都可能還有新的增進。這樣，你增進一點，我增進一點，這裏增進一點，那裏增進一點，今天增進一點，明天增進一點，只要大家的方法相同，方向一致，那麼「百川歸海」，終究有一天會有一種既不違背一般性而又凸出着特殊性的「定說」出現。

以上的這些看法鼓勵了我，使我也企圖對這方面的工作能有所參加。現在，先試就西周青銅器中銘辭字數較多因而史料價值也就更高的幾件文器之一，「曶鼎」，拿來加以淺釋，也許可以供給那些學習「社會發展簡史」或「政治經濟學」第二章而又要求瞭解中國具體史實的同志們，以一點寥星而微末的參考。

二、有關「曶鼎」的記述和解釋

「曶鼎」發現於清乾隆末季，阮元說，「器為鎮洋畢秋帆尚書（沅）所藏。」又說，「秋帆畢公得之於西安」。（均見「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卷四「曶鼎跋」）然而此器現在久已不存在了。（牠還不及「虢季子白盤」之依然保存，至今完好）。劉心源說，「此鼎已燬於火，原拓罕覯。」（見「奇觚室吉金文述」卷二）。因此，牠的體制花紋，已不能目驗。阮元說，「（錢）獻之云，鼎高二尺，圍四尺，深九寸，款足作牛首形。藝文類聚引三禮鼎器圖云，牛鼎，容一斛者也。」這按郭沫若先生青銅器四分期的說法（見「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彝器形象學試探」），此器當屬於第三期，亦即「開放期」。郭先生說，「開放期之器，則口弛腹稍斂，……足較低，彎曲作勢而呈馬蹄形。」從關於牠的形制的記述上，從牠的銘辭中的某些辭句上，郭沫若先生把牠確定為周孝王（公元前第九世紀）時的器，大概是不錯的。王國維也曾說，「此器乃宗周中葉物。」（見「觀堂集林」生霸死霸考）。

「曶鼎」不但原器已燬，即牠的銘辭拓本也不多見。吳大澂說，「此鼎出土時，字為銅銹所掩，後多剔損處，不及散盤、盂鼎、盾鼎之完好，然拓本已珍如星鳳矣。」（見顧廷龍「吳愙齋先生年譜」頁六三引四十三歲時所作「曶鼎跋」）清末民初的收藏家鄒安（適廬）也說，「余訪曶鼎近十年，未遇一可收者。」（見「周金文存曶鼎跋」）壬子年他才買到了已剔和未剔的兩種拓本，

他再記說，「余訪之十餘年，不能再有第三本。」可見拓本的珍貴了。牠的銘辭有三個特點：（一）字數較多——金長通闕文疑文在內共四百零七字，雖不及毛公層鼎之四百九十七字，然較散氏盤（近人稱「夨人盤」）之三百五十七字爲多，較之那些極簡單的僅記「某國某地某人作某器，子子孫孫永寶用」之類要有價値得多；（二）內容分三個單位——第一段記曶受賜作鼎祀其亡父的經過，第二段記曶因買賣奴隸的事與一個叫限的打官司的經過，第三段記匡族的人偷了曶的莊稼如何賠償的經過：三個內容，各成單位，翁方綱「跋散氏盤詩」就說，「半行款識從來少，三段還看曶鼎銘」；（三）牠對於中國古代社會的研究是一件稀有的參考資料——梁任公就說過，「西周時民間價權交易準折之狀況，及民事案件之裁判，古書中一無可考；自曶鼎出，推釋之即略見其概。」（見「中國歷史研究法」說史料篇）這說法中如「民間」「民事」等字樣雖然大可商量（因爲含義模糊不清），然僅就其指出曶鼎之重要性一點，還是對的。後來，到郭沫若先生，他才正確運用了「曶鼎」來做他那著名的「殷周奴隸社會論」的重要證據之一。

關於「曶鼎」銘辭的解釋（包括釋文和釋義），我們常見的有五種，見於如下五書：

1. 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據云，兼取錢獻之、吳侃叔兩家，而斷以己意）；
2. 吳式芬：「攈古錄金文」（僅釋文、無釋義）；
3. 吳大澂：「愙齋集古錄」（僅引錢獻之釋文）；
4. 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釋義甚詳，然其解說每病支離牽強）；
5.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一九三二及一九三五兩釋，後釋較詳，爲截止目前最可信者）。

這五種的釋文和釋義雖然各有不同，然大體上是差不多的。只很少幾處還存有紛歧。如銘辭第一節與第二節是否發生在一年的問題，王國維認爲「必爲一歲中事」，而郭先生認爲「首段與次段，尤不得在一年」。這中間牽涉到古代曆法問題，以及「既生霸」、「既望」、「既死霸」、「朔」究係一月中分爲四段、抑爲一月中某某四日的問題。關於這後一問題，王國維、董作賓前後各有說，郭子衡先生復自有說，均未固定。幸而此一問題之徹底解決與否，與「曶鼎」所記之事，無甚大關係。（然曶鼎對於生霸死霸問題之研究，則有甚大關係。）其次，關於字的辨識和解釋，如第三段㝵字，有釋作「受」的，有釋作「抑」的，有釋作「覓」（即「免」）的；再如第二段「償曶十秭，遺十秭，爲二十秭」，「爲」字一般都釋爲「總計」之意，而郭沫若先生獨釋爲「償曶十秭，饋送十秭，樹藝二十秭。」——這些還是沒有定論。在這一方面，（我倒認爲吳大澂的話還不錯，他說，「凡彝器不可識字，宜以闕疑爲是」。（「曶鼎跋」見「年譜」）。

不管在這些瑣節上還存在着紛歧，銘辭大意是究竟可以通曉的。這裏提及四個地名：周穆王太室、還居、參門、和㠱，前三個地方是王所居之處，後一地方是井叔所居之處。這裏還提及了二十個（！）人名，最高的自然是王（大概就是周孝王吧）和井叔（王的近親），其次是製鼎的主人曶，他是究伯的兒子，（請不要一見「伯」的字樣就立即想到五等諸侯和封建制吧，因爲「侯」「伯」等字樣在甲骨文裏是早就有過的了），也是因買賣奴隸而致訟的一造。他手下有一個「小子」叫允散（亦作散），用尋迅先生的話說，他大概就是曶的「奴隸總管」了。訴訟的另一造，名字叫限，他可能也是王室的同族，他也有一個「奴隸總管」叫䝿，另一個在訴訟中涉及的人叫效父。此外，這裏提到了六個「衆」或「夫」（即種田奴隸）的名字，叫陪、恒、龍、彝、相和嗌，又提到四個「臣」（即家內奴隸）的名字，叫𨑍、朏、𢓊和舟。此外，有一個匡族的代表叫匡季，另一個涉及的人叫𨑍及。在目前所能讀到的青銅器銘文中，涉及人名之多如曶鼎者，目前還沒有任何其他的例子。

三、「曶鼎」銘辭今譯

因爲考慮到印刷條件的限制，這裏不轉載銘辭的釋文了。但爲使讀者明瞭其內容計，謹擬郭沫若先生用語體翻譯「噫嘻」「七月」的辦法，把銘辭試譯如下：

「（周孝王）元年，六月，月亮既圓的時候，日子是乙亥，王在周穆王太室。王這樣說，「曶呀，我吩咐你管理你那亡父的祭祀，現在賞給你赤色的金屬環，你照辦吧。」王到還居去了，井叔又賞給曶赤色金屬□琳，曶接受了。曶用上好的金屬作成他那亡父究伯的煮牛大鼎。曶呀，願你好好地辦祭祀，你的子子孫孫要永久保存這祭器。

「（？年）四月，新的月光初生的時候，日子是丁酉，井叔在㠱。爲了一件買賣奴隸的事，曶的總管允散把另一位奴隸主限告到井叔這裏來了。允散說，「我已經買妥了他的五個種田奴隸。而且一個叫做效父的已經把身□匹馬一束絲取走了。」限卻說，那不是他的主意。他還答應吩咐䝿把馬送回，吩咐效父把絲送回。後來䝿和效父又拉我在王的參門地方改訂契約，改用一百寽的金屬來買那五個種田的奴隸。當時約定，假如還不繳奴隸，則再打官司。後來䝿果然又反悔，並將原金屬退回。」井叔說，「限乃王室之人，他不應該兩次與曶成約而又都失悔，他不該叫䝿說話不算話。」曶磕了頭，把五個種田奴隸贓收下來，奴隸的名字叫陪、叫恒、叫龍、叫彝、叫相，曶用羊酒和三寽的絲做見面禮去招致那五個奴隸。曶又告訴䝿說，「你要送給散五把箭頭子，」又說，「還要把你的公田和私田分讓些給散去居住並耕種。」䝿也只好說，「可以」。

「有一年遭逢荒年，匡族的種田奴隸和家內奴隸共二十名搶劫了曶的十秭（兩千把）莊稼。曶便把匡季告到東宮那裏去了。東宮告訴匡族說，「你們莫抵賴，老及和他的族人並沒有搶得莊稼；你們抵賴，將得重罰。」匡族的

人便向曶磕頭道歉，用五小方塊田，種田奴隸一名叫嗌，家內奴隸三名叫疐、叫朏、叫奠，說，「一共是四名。」又磕頭說，「那十秭莊稼並不完全是我們搶去的。」曶又告到東宮那裏去了，說，「一定要他們賠。」東宮說，「退還曶的十秭，外賠十秭，共二十秭。到來年不還，便加倍到四十秭。」匡族的人便又到曶這裏來，又增加了兩小方塊田，一名家內奴隸叫[illegible]，對曶說，「總共賠你七小方塊田和五名奴隸了。」曶收下了。計算起來，他等於受了匡族人三十秭莊稼的代價。」

四、從「曶鼎」銘辭引伸到周代社會的研究

從「曶鼎」銘辭的研究，我們至少可以看到三件事：第一，可以看到當時的社會構成。一個階級是「衆」（或「夫」）和「臣」，即種田奴隸和家內奴隸，從他們之可以被買賣、而並非隨田買賣、而賣的價錢又非常低的這一連串事實，可以充分確定他們一定是奴隸，而絕非農奴或甚至佃農。另一個階級是曶和限，以及王和井叔，這都是奴隸主階級，雖然王和井叔已作爲國王和貴族的形式而出現了。另外如允散、質、效父，他們是「小子」，是類乎卜辭中的「小臣」，詩中的「保介」、「田畯」一類的「奴隸總管」。第二，可以清楚地看到當時的奴隸價格，即一夫等於匹馬束絲，或等於金屬一百寽；奴隸的價錢低極了。第三，可以瞭解到當時土地制度和農業生產的一些情況，從匡族人寧願用到七小方塊田和五名奴隸而不願償還曶的莊稼，可以看到當時奴隸勞動力並不可寶貴，勞動力很低，所以人們寧願搶刼既有的勞動果實（那些禾），而並不希罕那些「夫」和「田」。——在青銅器之中，單憑銘辭的內容便可演繹出這麼一大堆推論來的，怕只有「曶鼎」了。

但是我們又絕不可孤立地強調「曶鼎」一器的史料價值，因爲第一，任何一件青銅器的史料價值之最高的發揮，是必須和其他的青銅器史料配合起來。例如我就常常想，著名的「散氏盤」的研究，假如能和「曶鼎」結合起來，對於宗周中葉前後的田土情況將會更加進瞭解。第二，他又必須和文獻的材料（如尙書、詩、周易等等，甚至[illegible]後一點的文獻）配合起來。例如，幾天前，我隨便翻讀舊日的讀書筆記，便發現如下的一條：

史記卷九十四田儋列傳：「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按：山東樂安）：狄城守，田儋詳（佯）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見狄令，因擊殺令。……」

裴駰集解：『服虔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儋欲殺令，故詐縛奴而以謁也。』

按服虔，東漢時人，他所謂「古」，當指戰國至秦楚之際，那個時候殺男女奴隸的事還是可以公行的，但必須做一道「合法」的手續，即僅是「告官」而已。從語氣中看來，殺奴隸的事在兩漢雖可仍然發生（如西晉時王敦仍可大殺奴婢），然已成爲不合法的事了。這麼一條小小的文獻史料不也正可以於「曶鼎」之外，有力地幫助我們確信戰國至秦楚之際正是由奴隸社會逐漸經過緩慢的過渡階段而進入到封建制的說法嗎？

一九五〇、四月廿日黎明前寫完

美國未成年勞動者的失業問題

易夢虹

美國在近年來一直爲各種各樣的問題苦悶着，因而十分狼狽周章；其中最頭痛的一個是失業問題。失業問題的主要內容雖是成人的失業問題，但是未成年勞動者的失業問題也構成很重要的一部份。

「未成年」這個詞相當於英文裏的 Teen aged，指的是從十三四歲到十九歲的孩子。在這個就學年齡階段的孩子們本來是應該還在學校裏受教育的，可是，由於資本主義制度所必然產生的種種弊害，若干家庭不得不忍痛讓他們的子女到工廠裏或農場上去胼手胝足地工作。關於美國一般家庭的經濟狀況，以後再爲文詳述，此地只舉幾個最近的統計數字以窺一般家庭捉襟見肘的窘況之一斑。如果把美國全國支出單位（Spending Unit），約等於一個平均大小的家庭）等分爲十級，依他們年收入的大小，由大而小地排列下來，我們可將一九四七和一九四八兩年內各級的淨儲蓄額（Net saving）在全年總儲蓄中所佔的比例依序書出如下：

一九四七	七十七	十六	六	六	三	四	二	負一	負二	負十一
一九四八	八十	十九	十五	六	六	一	負一	負三	負七	負十七

這個表雖然是割裂下來的，但已足以顯示美國貨幣收入大小相差的懸殊，以及一般家庭經濟情況的惡劣，而且就發展的趨勢看，這種惡劣的程度以後還要加深下去。十分之四的支出單位在一九四八年不但不能儲蓄，反而要動用過去的儲蓄。美國勞工統計局不久以前根據全國各城市生活費用的調查，估計每個家庭維持極低生活水平的年收入須在三千零四美元至三千四百五十八美元之間（依海勒 Heller 委員會統計，四口之家的最低生活維持費爲每年四千美元），但據美國人口調查局最近的報告一九四八年在美國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家庭其年收入低於這個標準。一九四八年後的情形更壞，據估計，有百分之五十七以上的家庭，其年收入在三千五百元以下。美國農業部曾作過估計，一九四九年美國農民純收入比一九四八減少了百分之十七，比一九四七減少了百分之二十二，估計今年將減少至只有一九四七年的三分之二；可是債務却增加了，有抵押的債務從一九四六一月一日的四十七億美元增加到一九五〇年一月一日的五十四億元，其他的債務也都有增加。這種情形是家庭裏的孩子不得不出來幫忙掙錢的主要原因。作者曾經參觀過密西根州的兩家汽車工廠，紐約城的一家

煉鋁工廠，和威士康辛州的兩家植物罐頭廠，都曾注意到未成年勞動者實際上估了一個不算太小的比例。他們的臉上找得出生活的烙印，沒有富家子弟的那份輕鬆和歡樂。

近年來，失業的浪潮不斷襲擊美國經濟，跟着一般失業問題的嚴重化，未成年勞動者的失業問題也跟着嚴重起來，因爲未成年勞動者在許多生產部門往往立於工作的輔助地位，是「產業後備軍」裏的弱環，所以其失業問題的嚴重程度往往較大。根據美國勞工部勞工標準局和人口普查局的研究報告，未成年勞動者的失業問題，即使在成人就業情況較佳的時候也是很大的。人口普查局曾經統計過，在過去三年中，十六歲到十九歲的未成年勞動者稱成美國勞動總量的百分之七，在遇到學校放假時，這個比例達到百分之九以上。在罐頭、包裝、鋸木、洗衣等工場和餐館旅社裏，未成年勞動者所佔比例經常爲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七十五。

依一九四九年四月的統計，十六歲到十九歲的未成年人數是八百二十萬一千人，十四歲到十五歲的有四百一十四萬一千人，總數是一千二百三十四萬二千人，與一九四〇年四月的數字相較，短了二百四十萬人左右，這是九年來生殖率減小的一種反映。値得我們注意的事是：儘管這一年齡階段的總人口數已呈減少，可是，已進入或待進入勞動市場去的少年男女却反而增加了，在同一期間內，十四歲到十九歲的孩子在勞動市場上的，從四百三十萬人增加到四百五十五萬六千人。根據美國商務部的統計，在一九四九年的四月裏，已經在出賣他們的勞力或者正在饑餓地尋找機會出賣他們勞力的孩子，在十四歲到十五歲的一組，每七個人裏就有一個；在十六歲到十七歲的一組，每三個人裏就有一個；在十八歲到十九歲的一組，每五個人裏就有三個。如把十六歲到十九歲視爲一個年齡的組距，那末，這個階段的孩子差不多有半數已經在勞動市場上了。我們得注意，在一個以機器來幫助剝削的經濟社會裡，出賣勞力可不是玩兒的！據美國勞工部工時組在一九四九初的報告，孩子們工作的時間往往長至每天十二三小時，在農場上作工的甚至長到每天十四小時；疲勞的工作已經足以阻抑孩子們身心的發展了，孩子們的輕率不經心又往往使工作的危險性增加，據最近的調查，十八歲以下的未成年勞動者在製造業作工的，其出事頻率(Frequency rate)比成人的要大百分之四十六。美國的玩意兒很多，引誘力很大，美國孩子的玩心又重，但他們却不得不硬着頭皮走進勞動市場去尋找受資本家剝削的機會，還不是由於沒有法子抵抗生活鞭子的撻伐的緣故？

下面的一個表揭示了一九四〇、一九四七和一九四九三年的四月間（這是在學期當中的一個月）未成年勞動者就業的估計數字：

年齡	一九四〇年四月	一九四七年四月	一九四九年四月
十四歲到十五歲	一九二、000	六三〇、000	六一九、000
十六歲到十七歲	七七〇、000	一、三四〇、000	一、三五二、000
十八歲到十九歲	一、九七〇、000	二、三三〇、000	二、三四三、000

由上表可見一九四九與一九四〇比較起來，十四歲到十七歲的孩子進入勞動市場的增加了大約一倍，十八歲到十九歲的孩子進入勞動市場的增加了百分之十還多。這說明了美國一般家庭經濟的惡化以致全部或部分地輟學作工的孩子漸漸增多。

☆　☆　☆

現在我們要來看看他們失業的情形了。根據美國全國失業趨勢的普查統計，在一九四七年的四月裏——這是一個相當景氣的時期——大約有三十九萬個十六歲到十九歲的孩子失了業。這一個數字說明了在這一個年齡階段的勞動者中，有百分之十被排擠在就業圈子之外。這情形一直到一九四九的四月都還沒有改善。

從一九四九年的春夏間起，成人的失業人數和未成年人的失業人數都同樣惡劣地上升，在四、九、六、七幾個月內，從十六到歲十九歲的未成年勞動者的失業率平均達到了百分之十四。在八八九月內，雖然製造業有了季節性的顛轉，然而從十六歲到十九歲的未成年勞動者的實際就業量，在八月的數字還是與七月的一樣。與一九四八年八月的數字相比，却少了四十五萬。

以一九四九年這四個月的情況而論，根據美國商務部的勞動月報，一方面，未成年勞動者的人數增加了，而且增加率很大；另一方面，失業的比率也在順着增大的趨勢發展，下面是作者所摘錄的幾個最近的統計數字：

一九四九年各月份	十六歲到十九歲未成年勞動者總人數	失業率
四月	三、九二七、〇〇〇	一一・三
五月	四、一二九、〇〇〇	一二・五
六月	四、九二四、〇〇〇	一七・七
七月	五、二二〇、〇〇〇	一五・三

看了這些數字，我們的感想是：第一，美國政府雖然一再標榜要減少失學人數，改進一般福利水平，可是事實上沒有能夠做到。一個專爲資本家服務的政府如何能實踐這樣艱巨的任務？第二，美國資本主義經濟長期和短期的不穩定性和衰退性，使得失業問題在長期和短期內都無法獲致合理的解決。

一九四九年春夏間未成年勞動者就業機會的稀少，反映在就業執照頒發數目的減低上。不過，這主要是就工業方面的勞動者而言，因爲農業方面的勞動者一般並不必要辦理這一項手續。就各州各城報告到勞工標準局的數字而論，一九四九年四、五、六三個月發給十六歲到十七歲的孩子的就業執照，較之一九四八年的同月，發給數各減少了百分之二十六、百分之三十四和百分之三十六。這個減少率是與月俱增的。七月的統計還不完全。但已顯示了減少率的繼續增加，達到了百分之四十一左右。在失業情形比較嚴重的地區，這個比率還要大。譬如麻沙秋謝州(Massachusetts)的新倍德福特(New Bedford)和吳士脫(Worcester)，羅德島的普羅維頓(Providence)，本雪文尼亞州的斯克拉頓(Scranton)和維克斯巴(Wilkes-Barre)以及田納西州(Tennessee)的納

息維爾（Nashville）等就是這種地區，就業執照的發給數額，一九四九的六月較之一九四八的六月，其減少比率就上述六地平均竟達百分之四十五之巨。

關於未成年勞動者的就業與失業問題，美國勞工標準局曾於一九四七年的春天，在肯塔基州(Kentucky)的路意斯維爾(Louisville)這個代表城市做了一個比較深入的調查研究。這一個調查研究是以一些詳細的談話為基礎的，談話的對象是五百二十四個少年男女，他們是依照自由選樣（Random Sampling）的原則被選出來的，他們的年齡都在十四歲到十九歲的範圍內。為了更能了解問題的眞象，研究的人員又做了一些訪問，對象是一些特選的僱主、勞工領袖和一些輔導少年就業機構的主持人。在調查期間已被僱的孩子就算是已就業者；如果被訪談的孩子自稱現在沒有工作，但在尋找工作中，就算是失業者；如果他們雖然現在沒有工作，但並未報告正在尋找工作，即不視為失業；如果他們雖然報告了正在積極尋找工作，但他們的父母親並不認為必要，則亦不視為失業。依據這些範疇，調查研究的結果，失業的比率在十四歲到十五歲的一組為百分之四十四，十六歲到十七歲的一組為百分之三十二。十八歲到十九歲的一組為百分之十八，後兩組合併且依加權方法計算起來，失業的比率為百分之二十三。

在談話中，有不少不在學的孩子之沒有報告正在尋找工作的原因不是他們不需要工作，也不是他們的家庭不需要他們工作，而是一再在尋找工作上所遭受的挫折失敗使他們灰頹了；或是因為還不知如何尋找工作，所以尚未積極進行。因此而生的數字上的偏誤如加修正，則從十六歲到十九歲未成年勞動者的失業率為百分之二十七。分組而論，失業率在十六歲到十七歲的一組為百分之三十六，在十八歲到十九歲的一組為百分之二十一，在十四歲到十五歲的一組則達到了百分之四十六。

這些失業率高得可怕。路意斯維爾是一個特別挑選出來的代表城市，舉一反三，我們不難由此推知美國全國未成年勞動者失業情況的嚴重。

☆ ☆ ☆

未成年勞動者的失業問題不能單獨解決，牠必需與一般的失業問題一同解決。可是談失業問題而離開了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解剖與檢視，其結果將仍然是落空的。採行凱因斯（J. M. Keynes）的理論，抄襲羅斯福新政（New Deal）的故技，充其極，也只能救之於一時，不能救之於永久，算不得根本解決之道。再走那樣的路線，在今天已經是極其不聰明的辦法了。

我的手邊剛巧可以找到蘇聯聯邦統計局所發表的一九四九年國民經濟國家計劃執行結果的公報，上面有如下的記載：

「一九四九年，蘇聯境內的七年制小學、中學、技術學校以及其他中等專門教育機關的學生數目，較一九四八年增加了一百萬名以上；七年制小學和中學的學生數目，已經超過了五年計劃中一九五〇年計劃為這些學校所預定的數額，一九四九年蘇聯境內在高等教育機關學習的學生，較一九四〇年增加了十九萬，技術學校與其他中等專門教育機關的學生名額，超過戰前十八萬四千。」

我又找出一九四〇年十月二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公布的「關於蘇聯國家勞動後備軍」的公告，上面有這末一段：

「在我們國內，失業現象已經完全消滅了，城市與鄉村中的貧窮與破產永遠結束了，因此，在我們這裏沒有那些被迫到工廠和製造廠中去敲門和要求的人，從而自發地形成工業的經常勞動力後備軍了。」

在上面我們列舉了不少的事實和數字，牠們都來自官方的報告。可是一方的報告裏充滿着陰沉的暗影，而另一方的報告裏卻展示着無限光明的前途。面對着這個鮮明的對比，我們的感想豈能兩樣？

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六日，北京。

附註：本文中的數字多從每月勞動評論(Monthly Labor Review)第六十九卷第六號(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出版)及勞工紀實(Labor Fact book)第九集中摘取，特此註明。

李大釗與五四運動

金毓黻

一

近來寫中國近代史的許多作家，都說李大釗是「五四運動」一員主將，也就是說李大釗是五四運動的領導者。(例如嵇岡)

又有人說：五四運動發動了中國文化革命，打倒了幾千年來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創始了新民主主義的新文化。這個任務不是在資產階級之下領導進行的，而是在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革命知識分子領導之下進行的。當時參加領導五四運動的代表人物如李大釗等，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驅。(例如胡華及陶官雲)

李大釗如何領導五四運動？他領導的實際情形如何？留到下文再說。五四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一個重要節目，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發端，這一運動起了劃時代的主導作用。李大釗不僅領導了這一運動，後來中國無產階級所組織的政黨——中國共產黨也是由他發起和推動的，而繼續了五四運動以後所應負責的歷史任務。結果他不單是完成了這一任務，而且是為了推進黨務，作了壯烈的犧牲。他這種始終一貫地、不屈不撓、為眞理而犧牲的偉大精神，是值得我們尊崇學習的。

我要寫一篇關于李大釗和北京大學的關係的紀事，現在我從五四運動和李大釗的關係說起，作為這篇紀事的發端，並把這部分先在「觀察」發表，以紀念今年的「五四」。我文中處處提到北京大學，是因為本稿原來的主題是敘述李大釗和北京大學的關係的原故。

李大釗別號守常，他在北洋法政專門學校畢業後，又

赴日本留學早稻田大學，前後都是學習政治經濟。他在日本因爲常常向「甲寅雜誌」投稿，就結識了章士釗，後來就由章士釗的介紹而到了北京大學。

我根據北京大學檔案不完全的記錄，知道章士釗是在一九一七年任北大教授，又從是年九月起兼北大圖書館主任，到一九一八年二月，章先生向北大校長蔡元培推薦李大釗繼續他作圖書館主任，蔡先生就答應了，自是時起，大釗先生就作了北大圖書館主任，但是不兼教授。這是我從一九一八年（民七）上季班印的北京大學二十週年紀念册考察出來的。

我又從北大不完全的檔案查出，自一九二〇年九月起，北大教授中就有李大釗姓名在內，一直到一九二五年八月，才注明停支薪水。這時北大延聘教授，例以一年爲期（每年從九月起至下年八月止），究竟大釗先生係從那一年做了北大教授？要費一點考證工夫。我考查一九一九年二月所印行的北大教職員錄，知道大釗先生在一九一九年九月以前，只担任圖書館主任。如果做了教授，應該從一九一九年九月開始，但以未找到這時候的檔案，所以也無從斷定。

據王森然所作的「李大釗評傳」和郭湛波的「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都說大釗先生是於民國九年（一九二〇）任北大教授，証以我查出的北大檔案，這話似乎可靠。但胡適在一九二三年所作的「近五十年之中國文學」上說：「民七（一九一八）一月以後，新青年重新出版，歸北大教授陳獨秀、錢玄同、沈尹默、李大釗、劉復、胡適六人輪流編輯」。照這些話來推測，可能大釗先生從一九一八年八月就做了教授。這一小問題，留待將來得到正確文獻，再來決定。

大釗先生把北大圖書館主任辭去，是在一九二一年九月蔡校長自法國回校以後，繼續他作主任的是皮宗石。大釗先生辭去主任以後，就以教授而兼任校長室秘書。

根據北大檔案紀載，大釗先生所開的課程，在史學系開過「唯物史觀」、「史學思想史」。在政治經濟兩系開過「現代政治」和「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又有人說，他在法律系開過「社會立法」。他又兼任過國立女子師範大學私立朝陽大學教授，在女師大開過「女權運動史」等課程。

大釗先生是在一九二五年八月，才正式脫離了北大，離開北大的第三年即一九二七年四月，被張作霖的政府逮捕，在那月的二十八日他就光榮地爲主義而犧牲了！

根據許多的史料，可以知道，大釗先生對於共產主義思想的研究及領導，五四運動的推動，以及組織共產黨的工作，都是非常努力，而作了先知先覺。這一段李大釗的歷史，是值得稱述的一段歷史。

二

李大釗先生對於五四運動，是否作了領導？是否在這一運動中發生了主導作用？領導這一運動的是否尙有他人在內？這是值得討論的一個問題。

華崗在他所作的「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上說過：「李大釗是五四運動的一個主將，他是五四運動時代一個典型人物」。他所舉的證據，是他在一九一六年所作的「靑春」一篇文章。他以爲大釗先生所說的：「吾族靑年所當信誓旦旦以昭示後世者，不在辨證白首中國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靑春中國之再生，不在白首中國之苟延殘喘，而在靑春中國之投胎復活」等等話頭。就是「對於舊的中國作了死刑的宣告，同時對於新的中國抱着無限的希望」。固然，大釗先生這樣的玲瓏透剔的說法，是給當時的大多數靑年學生，有了無限的啓發，而發生了極重大的作用。但是不能說五四運動是由於大釗作這一篇文章而直接領導出來的。換句話說，這篇文章對於五四運動有了重大的影響，而不能說就是領導。

去年（一九四九年）紀念五四運動三十週年時，勞崇先生作過以「五四運動的領導者李大釗」爲題的論文。他說：「李大釗的名字和五四運動是分不開的。」他又說：「李大釗在五四運動前夕，發表了兩篇號召中國革命進軍的文章，那兩篇文章，就是有名的『庶民的勝利』和『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他又說：「第一次在中國出現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這個主義的傳播者之一就是李大釗；掌握了中國革命的方向，使由舊民主主義轉向新民主主義的早期領導人之一，就是李大釗」。這是說大釗先生所作的兩篇文章，對於後來的五四運動，有了很大的啓示，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大釗先生之領導五四運動，不能單提出這兩文篇章來作證明。再進一步說，大釗先生是掌握了中國革命的方向，是中國革命早期領導人之一，固然不錯，但對於大釗先生如何來領導五四運動？仍不能作具體的說明。

一九三三年魯迅給「守常文集」作序。他說：「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槍斃徒手請願的學生的那一次，他（大釗先生）也在群衆中，給一個兵抓住了，問他是何等樣人？答說是做買賣的。兵說，那末，到這裏來幹什麼，滾你的罷！一推，他總算逃得了性命。」照這一次的事實，證明大釗是親身參加群衆中而作了指揮者，還不算眞正地來領導這一次的學生運動。拿後來的實際行動，來說明前一期的領導群衆運動的問題，也可以想像到大釗先生來實際參加這次的五四運動。

據我多方調查的結果，那時候的李大釗先生，的確有參加領導這一運動的可能性，要說明這一問題，應該從北大圖書館本身說起。

北大圖書館原設在北大第三院（現在的理學院）後樓。一九一八年秋天漢花園北大第一院的紅樓落成，便把圖書館移入紅樓的下層，分爲二十一個書庫，六個閱覽室，這都是經過大釗先生親手計劃的。

圖書館的主任室，是在紅樓下層東南角，靠南頭的一連兩間，外間作會議室，內間作主任室。要進入主任室，必須先進外間的門，通過會議室，才能進入，因爲內間的門，是在內外兩間的隔壁上的原故。

在五四運動以前，就有許多同學讀過大釗先生在新靑年雜誌和其他報紙所發表的文章，非常欽佩他的見解，常常來向他請敎，因此他的主任室的外間，便常常有同學們的足跡。並且常在外間開討論會，當時參加討論會的，當然不能限定於北大同學，但是以北大同學居其多數。

美國記者斯諾所作的「西行漫記」其中各訪問記爲「毛澤東自傳」的一篇，是根據毛主席口述寫出來的，當然可靠。毛主席說：「當我在北大任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在李大釗領導之下，我就很快地發展，走上馬克思主義之路」。毛主席是一九一八年（想係秋天）來到北大圖書館，第二年的年初，就離開了北大而轉到上海，（據斯諾所記）。五四運動發生的時候，毛主席不在北京，而且在五四運動以前，大釗先生就積極推動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而啓發了毛主席，當然同時受他啓發的尙有不少的北大同學，這就是大釗先生能來領導五四運動的一個有力的旁證。

大釗先生對於推動馬克思主義研究，是這樣的積極，也就是對於反帝反封建的中國革命起了積極的作用。我想他一聽到巴黎和會的山東問題，受了帝國主義的過分壓迫，馬上就要承認簽字，而我們的政府那種軟弱的無能，而且在政府中曹章陸一般人，都是和帝國主義方相勾結，他一定非常氣憤，常和他接近的北大同學，當然要受了他的感動，無形之中也就受了他的指導。這樣的情形，應該是大釗先生來領導這一運動的主導主用。

據當時常接近大釗先生的幾位北京老同學，談起這回事情，在五四運動前後，圖書館主任室的外間，是不斷地

開會，是不斷地有同學們來參加。雖然不能說是計劃和指導五四運動，但是這樣不先不後地開會，定然是和五四運動有點關係。

根據上文的敘述，大釗先生雖然受了客觀條件的限制，無法像後來的三一八運動，親身參加在請願隊伍裏，但是他能用側面間接的方法來鼓吹這一運動，就等於實際來領導這一運動。

五四運動的領導者，除了大釗先生之外，是否尚有其他的人在內？也正要討論一下。

有人說過，最初提醒北大同學，知道巴黎和會上的山東問題，已臨到嚴重關頭的，是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五四運動發生以後，一部分同學被捉將官裏去，盡力援救學生而不肯向政府低頭的，也是蔡先生。這是不是有了領導這一運動的意義？我們只可說，蔡先生對於五四運動有了啓發，有了帮助，而不是領導。

有人說，五四運動的意義，不能專就五四那一天的行動來說明，應該把前一段的新文化運動，後一段的（如六一三）各地方繼續不斷地罷課罷工，合併起來計算，才能夠具體說明這一運動。因此，如陳獨秀，如胡適之，如魯迅，都對這一運動發生了作用，是否五四運動也有他們參加領導在內？

反帝反封建是執行中國革命的主流，誰能掌握這一主流，誰就是領導者。這時候的陳獨秀是新青年雜誌的主持人，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也很積極，對於五四運動的影響當然很大，我們不能因為他後來走上機會主義的道路，就把他前一階段的成績一筆抹殺。胡適和魯迅都是新文化運動的健將。華崗曾經說過，「魯迅是五四運動的另一主將。」這是對的。但這時候的魯迅，更不像李大釗能有參加領導五四運動的機會，只是說他的文學創造，對於五四運動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已。至於胡適對於政治的主張，根本就和李大釗不同，關於此節，業已有人說過了。歸根結底來說，當時掌握中國革命的主流，最正確而又最積極的應該是李大釗先生，因此他就成為五四運動的領導者。

三

李大釗先生不單是一位名教授，也是一位有名的新聞記者，他編輯過的日報和雜誌，一時也數不清。經我查明他在五四運動前後參加編輯的雜誌，只有「新青年」、「每週評論」、和「少年中國」三種，是與北京大學有關係，此外的日報和雜誌姑且略而不談。

新青年雜誌是一九一五年九月在上海出版的，由陳獨秀主編。等到一九一八年一月重新出版，便由陳獨秀、胡適、李大釗等輪流編輯，上文業已說過。大釗在「新青年」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青春」，時間是在一九一六年（二卷一號）。等到大釗先生入北大以後，五四運動以前，他在新青年發表的作品，一共有六篇：一、「青年與老人」。二、「今」。三、「新的舊的」。四、「庶民的勝利」。五、「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六、「戰後之婦人」。在五四運動的當時，又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篇。

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大釗先生又和陳獨秀創辦一種小型報，因為每一星期出版一次，所以叫做「每週評論」。最初是以北大國文系進步教授如胡適、錢玄同、劉復、馬裕藻、沈尹默等做底子，每一人出現洋五元。當時名義上的編輯部是在北京宣武門外米市胡同七十九號，其實都是大釗先生和他幾個朋友担任編輯及校對，他因為白天事忙，常常夜間回到宣武門內回回營的寓所，來完成他編輯及校對的任務，因為這樣的情形，北大一部分的同學，如辦「新潮」雜誌的一般人，就常常和他接近，因此就發生研究新思想的問題，而領導了五四運動。

「每週評論」從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開始出版，至一九一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停刊，共出了三十六期。我以為這個週刊比「新青年」尤為重要，因為「新青年」是由陳獨秀主編，在上海出版，一月一期，而且常常脫期，對於當時的新文化運動，固然有了主導作用，但是大釗先生等積極分子，以為領導思想和運動，都感覺到不甚敏活，所以就在北京創辦了每星期出版一次的小型報——「每週評論」。

「每週評論」是在五四運動前五個月出版的，又是大釗先生與陳獨秀合編的刊物。我們要考查五四運動是否李大釗來領導的這一問題？似乎應該在這小報上來摸索，比較向「新青年」摸索，更能正確地得到結論，這就是我們要注意的一個重點。

在靠近五四運動的幾期每週評論，特別提出山東問題的危機，以喚起社會的注意。又例如對於曹章陸三人的行為，有下列極深刻的批評。

（一）章宗祥曹汝霖陸宗輿社會上說他們是親日派，這次章公使由日本回國，許多中國留學生都手拿上面寫着賣國賊三個字的旗子，送到東站。（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日）

（二）駐日章公使回國的時候，三百多留學生趕到東站，大叫賣國賊，把上面寫了「賣國賊」「礦山鐵道盡斷送外人」「禍國」的白旗，雪片似的向車中擲去，把一位夫人嚇得哭了。其實章宗祥很有笑罵由他笑罵的度量，只苦了他的夫人。

（三）段內閣和（日本）寺內內閣時代的二萬萬圓借款，不用說都是曹陸章三人的大功。這回設法妨害巴黎專使提案的親日派賣國賊，還沒有查實是誰，上海商業公團又居然歸功於曹汝霖。我想曹汝霖必然暗中笑道，就是你們中華民國的全國國民都站起來罵我，我不但不怕，而且正於我有大大的利益。

（四）有人說陸宗輿中華匯業銀行是中日合辦的，有人說完全是日本的銀行，我們實在弄不清楚。為了吉黑兩省金鑛森林借款的事，那中華匯業銀行總理陸宗輿給中華民國農商總長財政總長的信，滿紙的貴國、貴政府。這匯業銀行到底是那國的銀行？陸宗輿到底是那國的人？我們實在弄不清楚。（以上三條均見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這些批評都載在每週評論的「隨感錄」，除第三條外，都署名「隻眼」，應該是出於陳獨秀的手筆。

大釗先生在「每週評論」中發表的議論和筆記也不算少，都署一個「常」字或「守常」二字，也有時候寫做「明明」。在靠近五四運動的時候，對於山東問題，不見有署「常」字的議論，這是什麼原故？我以為這時陳獨秀的議論，就是大釗先生要說的話。况且在這時候的大釗先生，如果另有實際工作，當然非常忙碌，無暇及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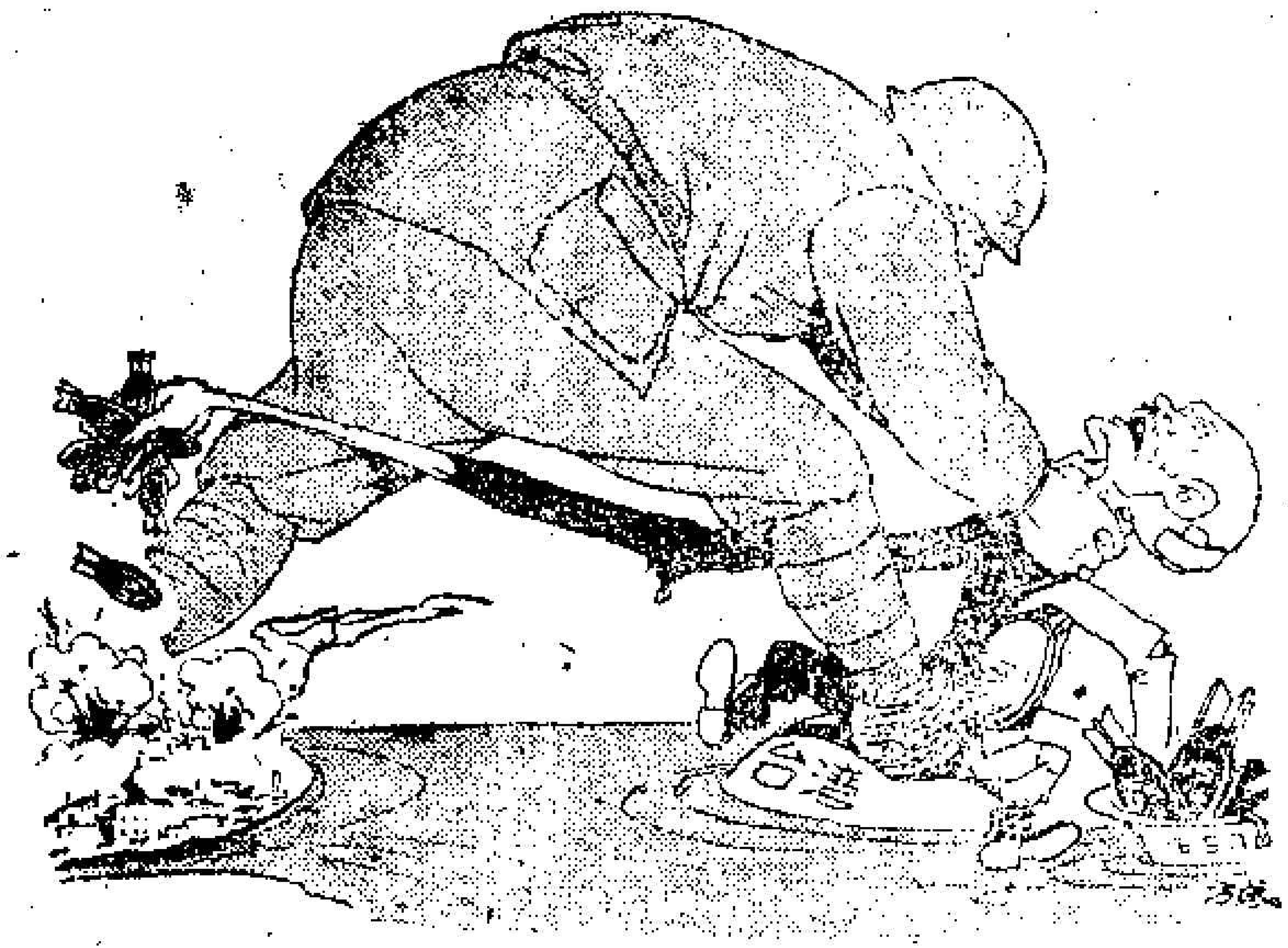
「每週評論」中特別指出曹章陸三人的賣國罪行，就是指示在社會間的群衆，應該給這三個人以重大打擊。以這樣的態度來說，就是對於五四運動起了領導作用的證明。至於直接領導這一運動的人，大釗先生之外，也不能不算陳獨秀在內。

在五四運動以後，「每週評論」的態度，更分外地積極起來，當然也有大釗先生鼓動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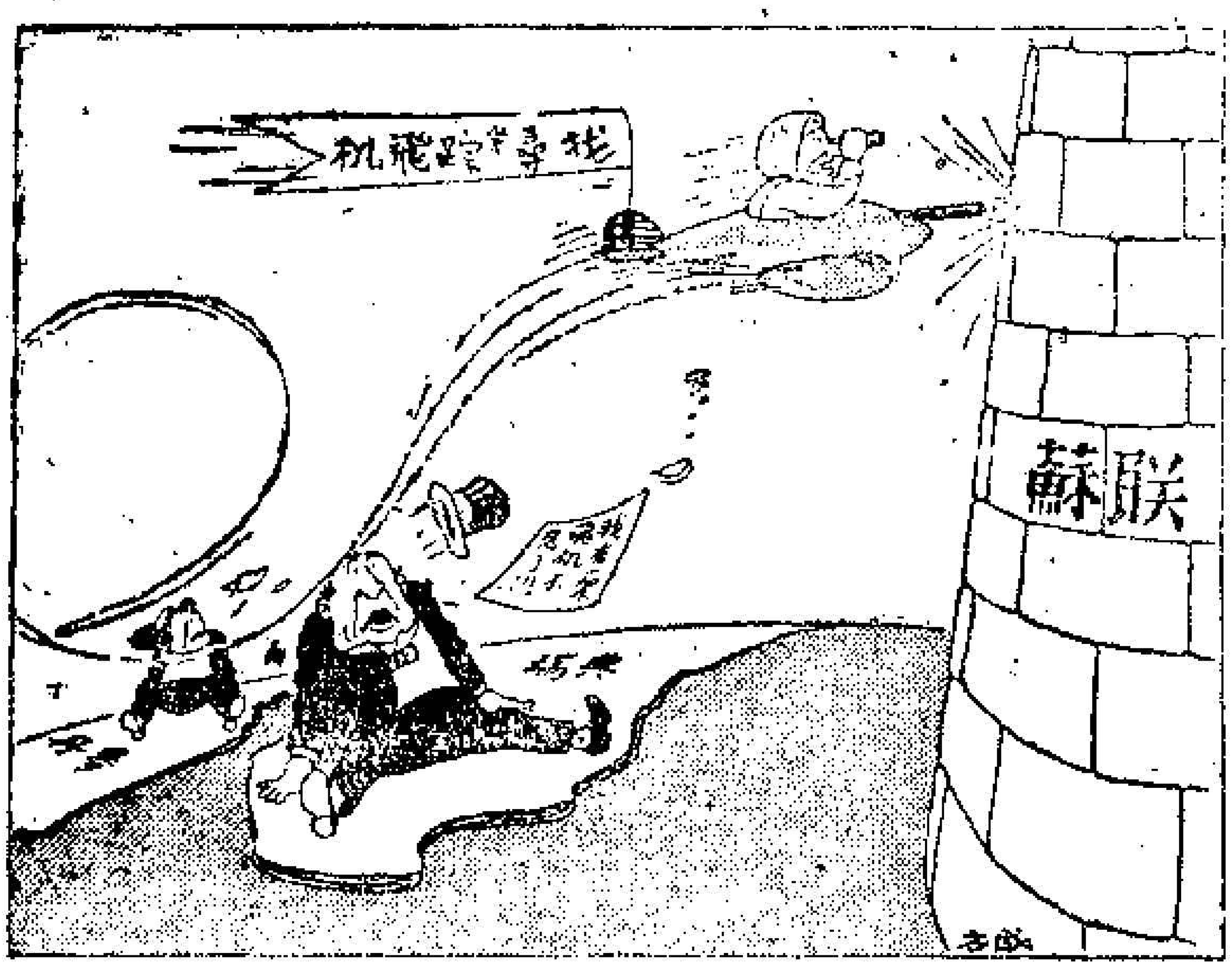
大釗先生在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巴黎和約簽字的那一天，寫出幾條筆記，發表在每週評論的隨感錄上。最痛切地是「新華門前的血淚」和「哭的笑的」兩條。他說：「這樣的炎天酷日，大家又跑到新華門前，一滴血一滴淚的哭，唉，可憐，這斑斑的血淚，只是空灑了新華門前的一片塵土」。又說：「今天是和約簽字的日子，巴黎的

觀察漫畫

1950，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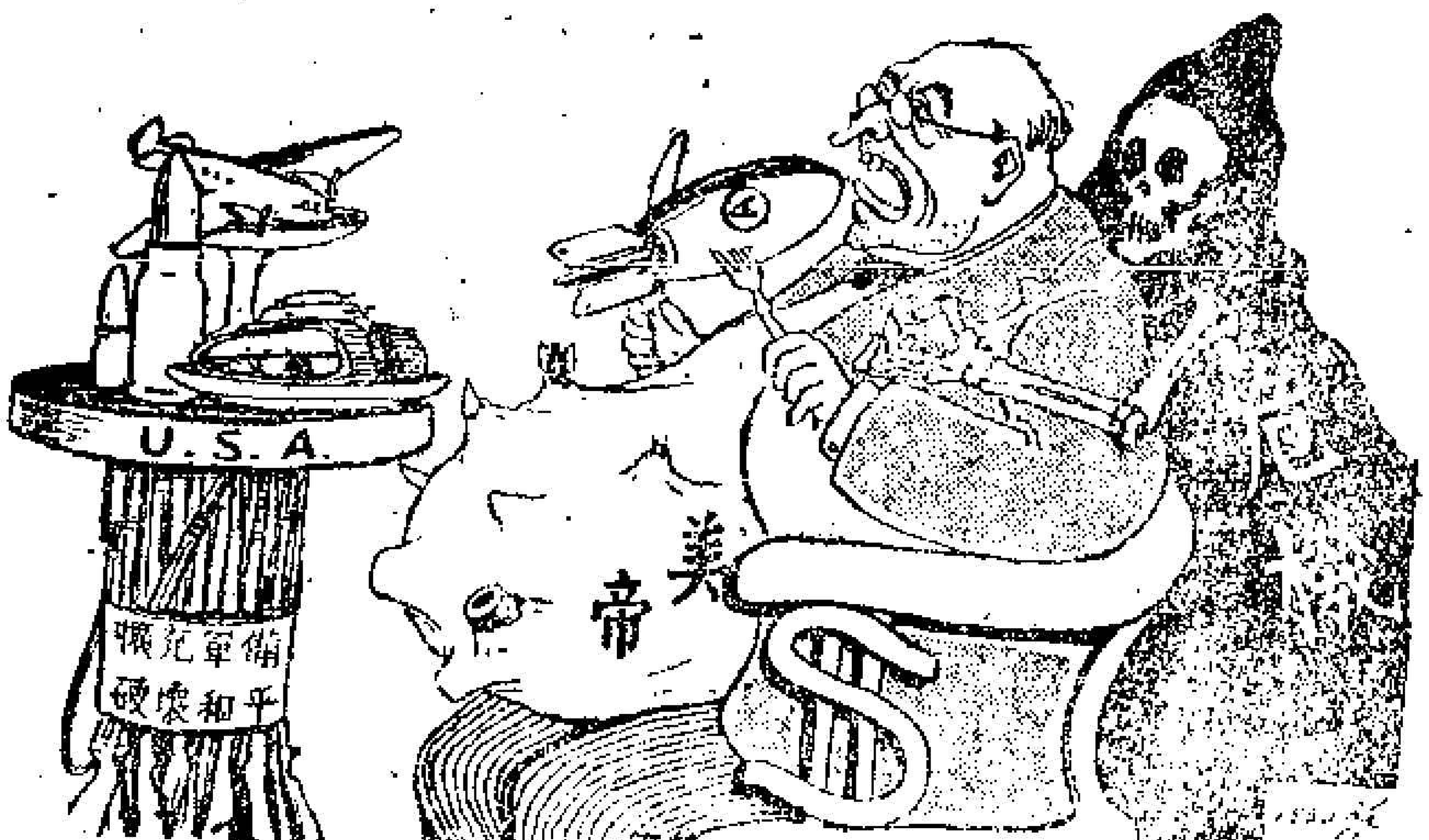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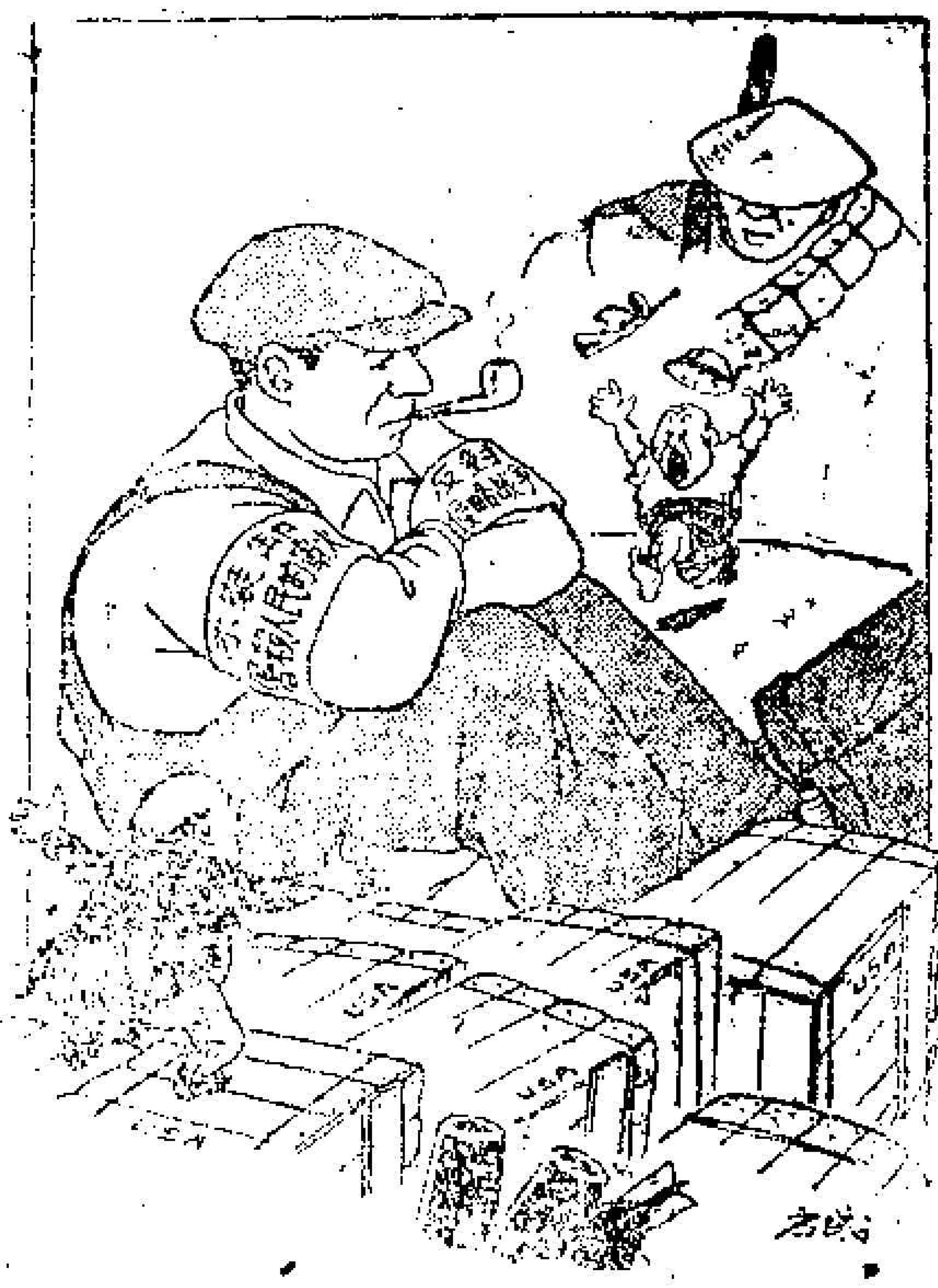
血債必須清算　　方成作



瘋狂的陰謀者　　方成作

饕餮者　　鍾靈作





世界工人是一家　　方成作

兄弟之邦·互利合作　　丁深作

歡聲必能送入全世界人的耳鼓，可是我們應該常紀念着今年今日新華門的哭聲。」這說的是如何慘痛而動人，這不是文字，而是血淚。

大釗先生和理論配合的實際行動，在前面已說過了，單就他在「每週評論」一個小報上的表現，也就非常可觀了。

由此可見，大釗先生在「新青年」發表的「青春」和「今」兩篇名作，對於中國思想界的革新，已起了劃時代的作用。又如「庶民的勝利」和「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兩篇名作，對於五四運動發生了主導作用，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但是我們必須知道，「新青年」的言論，所給予那一時期的影響，是和「每週評論」兩相配合起來，所給予一個新社會的影響。我們不應該單單強調「新青年」，而忘記了「每週評論」。

大釗先生在一九一八年六月和王光祈等發起「少年中國學會」，一九一九年七月學會正式成立，就於是年七月十五日創刊了「少年中國」雜誌。這個雜誌的編輯主任就是大釗先生，其中登載幾篇他所作的論文、筆記和新體詩。這時候的少年中國學會常在北大圖書館開會，在雜誌裏記載很詳細。這一雜誌對於當日的新思想新文化的運動，起了很大的作用。這也是大釗先生在北大工作期間所推動的一件大事。

四

李大釗担任北京圖書館主任以後，就和在北京的蘇聯人士有了往來。

在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以後，蘇聯就常常派工作人員駐在北京，和中國進步人士作了聯系。最初和大釗先生常常往來的却有兩個俄國人。

一位是蘇聯派在北京工作的「魏金斯基」，一位是白俄而很進步的「柏列衛」。柏列衛係北京俄文專修舘俄文教員，也在北大做過兼任俄文教員，因此他和北大許多先生有了因緣，因此促成大釗先生喜歡和蘇聯人接近。但是播傳共產主義思想於大釗先生的，是魏金斯基，而不是柏列衛。至於大釗先生能和魏金斯基接近，也和柏列衛有點關係。

後來蘇聯政府先後正式派遣馬林、加拉罕、越飛到北京的時候，也和大釗先生作了聯系。當那時候大釗先生的北洋法政同學在直系軍閥吳佩孚幕府中有點力量，於是大釗先生和直系軍閥有點聯系。馬林等爲了完成他們的使命，必須要和直系軍閥拉攏，他們請大釗先生來作媒介，也是可能的事。

馬林等來到中國，聲明把從前帝俄政府在中國所得一切權益概行放棄，關於庚子賠款的一部分，當然也要仿照英法美日各國辦法交還中國政府，專辦文化事業。像大釗先生在北京教育界已經有了學術地位，而且思想前進，自然，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物。因此馬林等願意先從教育界入手，向中國進步人士取得聯系，大釗先生就是一位最適宜的人物。

當大釗先生担任北大圖書舘主任時期，常常有蘇聯人士來到圖書舘訪問，大約就是魏金斯基和柏列衛一流人物。

大釗先生和魏金斯基等有了往來以後，就加緊地研究馬克思主義，在五四運動的後一年（一九二〇）北京就有了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在這時候陳獨秀已離開了北大，到了上海，因此在北方領導研究的是大釗先生，在南方的主持人就是陳獨秀。這樣的研究小組，就是下一年——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在上海成立中國共產黨的基本隊伍。

當中國共產黨在上海開成立會的時候，出席代表只有十三個人，代表北京黨員的是張國燾劉仁靜兩個人。據周佛海（日本留學生代表）「往矣集」上記載，馬林也在上海參加這個成立會。當時大釗先生何以不能前來參加，大約是在北京所負任務太重，不易於離開的原故。

蘇聯首先派到北京的代表和大釗先生接近的應該是馬林（他前後來到中國三次），馬林在北京不得要領，乃轉變方向到南方（桂林），要和孫中山先生會面。

馬林和中山先生會面，是誰介紹的呢？有人說是大釗先生介紹的。這時候是一九二一年的冬天，大釗先生以北大教授兼任校長室的秘書，和蔡校長的關係相當密切，便把這件事件告訴了蔡校長，蔡校長非常同意此事，便立刻寫信把馬林介紹給中山先生。這時候的大釗先生，是否和中山有了往來？是否他又寫信介紹馬林？是無法查考了。

然而孫中山先生從此就逐漸地接受了蘇聯共產主義思想，而要改組國民黨。後來蘇聯再派越飛來到中國，就在一九二三年一月和中山先生在上海共同發表了「孫文越飛宣言」。等到是年年底，中國共產黨員加入了國民黨，共產國際也派鮑羅廷來做孫中山先生的顧問，這時候大釗先生是在廣州對於國共合作一事非常出力。這樣一連串的事實，使得在中國的共產主義思想特別發展起來。

一九二四年一月國民黨在廣州改組的時候，大釗先生便以共產黨員而加入了國民黨，又做了國民黨的中央委員。但是他在此後仍然常駐北京，指導北方的黨務工作，他仍然是北京大學教授的一員。

我對於大釗先生組織共產黨的活動，及他和蘇聯使節的聯系，都是向各方面採訪所得的資料，並沒有豐富的文獻根據，所以我不敢再多說。

在大釗先生未脫離北大工作崗位的時候，已經有過一段幾乎被捉將官裏去的故事，我把這件事敘述一下，即作本文的結束。

現在北京大學博物館內陳列有關於李大釗的一件文獻，係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三月二十日「教育部訓令」，內稱：「北京大學首唱共產黨李大釗字秀昌（守常之訛）現任該校第三院教員休息室（又說是寄宿舍），招集黨員，密開會議，其宗旨係令各黨員分派成組，密往京師中學以上，運動學生加入該黨，通飭各校嚴行防範」，下署「教育總長王九齡」字樣。馬叙倫先生最近在他所作的「我在六十歲以前」一本書裏，也記載過這件事。他說：「我在教育部時（代理部務）有一件事情，幸而是我在教育部，原來內務部得到情報，說共產黨首領李大釗在各校活動，咨請教育部查辦，我把他壓下了，否則李先生不必等到張作霖做大元帥就會被捕」。我查這年的北京段執政的政府公報，內載：教育次長馬叙倫於三月十七日免職，他免職的原因，係教育總長王九齡赴部就職的那一天，遭到了國立八校教職員的阻拒，因此遷怒到代理部務的馬次長，疑心他有了作用。由此可以證明，這件事是先被馬先生壓下了，王九齡就職後惱羞成怒，又把這件訓令辦出來，而頒發到了各校。

這件訓令裏只說到「通飭各校嚴行防範」，也不過是照例文章，並未說將李大釗逮捕，這就是表明了國立八校教職員團結的有力，再過了半個多月，王九齡（他是雲南督軍唐繼堯的代表）也做不下去而滾蛋了。

附記

一、參考資料最重要者，爲新青年、每週評論、少年中國三種。其他已見本文者，不復備舉。

二、與北京圖書舘有關係的袁行巖、張申府、朱尚瑞、王錫英諸先生，皆以難得資料供給我作參考，特此志謝。

一九五〇、四、十四、於北大文科研究所。

從文化觀點上回首「五四」

楊振聲

大家都知道「五四」是舊民主主義走向新民主主義的初步，也是舊文化轉向新文化的開端。在政治上，為了當時未能清楚地規定中國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因而也未能鮮明地提出反帝反封建的口號。但當時所謂「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旗幟，使它在本質上成為反帝反封建的啓蒙運動。而在文化上，它却是一古腦地反對中國舊文化，而又盲目地崇拜西洋新文化。換句話說，便是無批判地反對中國文化，而又無批判地接受西洋文化。在表面上看，政治與文化的趨向似不一致；但在內容上看，二者也有聯繫。外抗強權，而又欲學其致強的原因，故一切吸收；內傷貧弱，而又欲消滅其貧弱的來源，故一切打倒。雖矯枉過正，勢有必然；但到底是過正了。

這可分為對中國文化態度與對西洋文化態度兩方面說：當時對自己的文化，凡風俗、禮教、哲學、藝術、文學等只要是中國的舊東西，就不加分別，一概反對。誠然在這些東西裡，有大部的封建思想與毒素，造成了中國貧弱的因素；但不借自己的過去，何以創造自己的未來？當時就沒人那末問一句。譬如中國的舊劇罷，我們那時的新人物，看了不過一兩本歐洲的劇本，就認為中國舊劇萬萬要不得。歌唱不自然（因為根本就不知道歐洲也有歌劇），對話不自然，服裝不自然，台步不自然，臉譜不自然，男扮女裝更不自然（當然不知道莎氏比亞的珠麗亞也是男子扮的）。於是只有幾個人坐在沙龍裏提倡易卜生、王爾德、蕭伯納，而人民大衆却在那裏心領神會地欣賞着譚鑫培、楊小樓與梅蘭芳。我就是那末個好榜樣，在北京讀了幾年書，沒有看見過譚鑫培什麼樣！

講到建築，我們的屋頂的輝煌、莊嚴，頂棚、屋簷間彩畫的繽紛，門窗格扇上圖案的精巧，都是舉世無比的，可是我們視若無睹。說起來慚愧之至，直到外國的建築師建造了前門箭樓、燕京大學與北京圖書館，我們才認識到自己建築的特點。而我們原有的天壇、午門、天安門的壯麗，實是人類自有建築以來的光榮。中國的青銅器、陶瓷，都是手工業藝術，而在藝術造型上與時代的先後上都是世界第一。其他絲綉、剔紅、雕填、刻竹、景泰藍，都是我們獨創的手工業藝術。可是直到外國的博物館把這些可誇耀的美術品陳列起來，我們才恍然於我們過去的光榮。中國的山水畫，是在繪畫史上獨具一格的。我們在五四以後就看它不起，或者說看它不懂。而在一九一一，英國勞倫斯·賓陽寫了「龍的飛翔」（The Flight of the Dragon by Laurence Binyon），已經把它捧上九霄了。不久前莫斯科的中國藝術展覽會中陳列中國書法的時候，我們的學生已經只會用自來水筆寫字了。

假若我們老是那樣，對於過去文化，不學會分析批判，分別地加以揚棄或發展其優點，我們就等於沒有歷史，也就沒有發展，沒有明天。

再講那時對西洋文化的態度罷，這是一物的陰陽兩面。天哪，那眞有點奴性的崇拜！中國菜的味道好，外國人都一致點頭；可是中國人那時把西餐譯為「大餐」，請客非此不文明。新人物一定住洋房，連沙發椅子都得從歐洲運來。小說中新戲上的主要角色，一定是洋裝革履，脈脈登場。使人想起十八世紀末俄國喀德琳女皇時代的崇尚法國文化，以及十九世紀初尼古拉一世時代的崇尚英國文化，情形與我們那個時候有些類似。可是這些盲目的崇拜，只能給俄國文化以刺激，却不能創造俄國的新文藝。直至普希金以傑出的天才，吸收了歐洲的文化後，從俄國人民的語言中提煉出文學的語言，從俄國的民間故事與人民詩歌中，發育成文學的素質，他才是「第一個將俄羅斯的美的藝術形式給予我們，這種美是直接從俄羅斯靈魂中發出來，直接在人民的眞理中和在我們的土壤中獲得而被他探尋到的。」（陀斯妥耶夫斯基——作家日記）也才能接着他來了果戈理、屠格涅夫、托爾斯泰、契訶夫、高爾基這些偉大的作家之群。他們不獨奠定了俄國文學的現實基礎，也開闢了蘇聯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文學的先路。

這裏既說到文藝，就不妨專講文藝，因為文藝正是一切文化的結晶。可是回視我們自己，又是慚愧。在五四後，大家一直在嚷：「我們為什麼沒有偉大的作品？」為什麼？就因為盲目的崇拜偉大與刻板的模倣偉大，都不是偉大，也不可能創造偉大。旣不是土生土長的，就不是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這個基礎的飄渺與出路的窄小，就斷定了文藝微弱的命運。只有在偉大的基礎上與偉大的出路上去尋求偉大的創作。任何國家中最偉大的莫過於人民。五四以來的文化啓蒙運動，一直摸索到「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才找到了這個偉大的基礎與出路。老實說，在這以前，連解放區的作品都還作不到偉大，其他地方的出品更不用說了。在這以後，整個人民的創造力被解放了，這力量正在那裏生長，正在那裏跳躍，它馬上會發光的，並且已經點點地向外放射了。

舉辦了一次新型展覽會的經驗

袁翰青

一九五〇年二月十七日到廿八日，是舊曆的元旦到正月十二日，在首都北京，由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科學普及局組織了師範大學、北大醫學院、北大博物館專修科、北京市公共衛生局、北京市文教局等三十七個學校、機關和團體，舉辦了一個科學知識展覽會。舉辦這個展覽會的目的有三個：一是利用舊曆年節北京市民遊逛廠甸的機會，做一些科學知識普及的工作。二是想由這一次展覽會吸取些經驗，可以知道在新民主主義的社會裏，怎樣來舉辦一個新型的展覽會。三是使參加工作的科學工作者、文教工作者和青年學生有接近民衆、了解民衆並且進一步向民衆學習的機會。經過一個半月的籌備工作和十二天的展出，這三個目的是部分地達到了的，而得到的經驗尤其值得總結起來，向全國報導，作為各地將來舉辦展覽會的參考。

一、展覽內容在原則上的確定

展覽些什麼？這是籌備會上討論的第一個問題。在過去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時代，各地也曾舉辦過科學展覽會，

例如一九四八年的十月十日在南京曾經有過這樣的會，是由十幾個科學團體主辦的；可是參加那次工作的幾位主要負責人告訴我們，那個展覽會是澈底失敗的，因爲展覽品是由各方面雜湊起來的，徒有陳列的形式而沒有教育的意義。我們今天消費人民的小米所舉辦的會，決定要使人民大衆參觀之後，在科學知識水平上能提高一寸。因此，展覽品就不能沒有重心，不能不針對着人民大衆當前的需要。最初是想以衣、食、住、行四方面爲主題，將有關的科學知識利用圖畫、模型和實物展覽出來。稍一深入的討論，就感到這四方面牽涉到的科學知識太廣泛了，決不是短期間所能籌備得了，也不是一個展覽會所能包羅得了的。

根據了參加籌備的這些單位所能貢獻的人力和物力基礎，估計了參觀者可能接受的情形和展品的教育意義，籌委會於詳細商討之後，決定將這一次的展覽分成「婦幼衛生」，「從猿到人」，「一般科學」三個部分。婦幼衛生知識關係民族的健康，其重要性和値得着重地普及是毋須解釋的。「從猿到人」這一部分是介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的一段知識，當目前在大力地進行着社會發展史的敎育的期間，這是一個首先觸到的問題，有千千萬萬的幹部和知識分子在學習的時候，對於「從猿到人」這一點提出無數的疑問，而對於這些疑問的解答，單憑口頭和文字的說明常常是不夠的。因此，用圖畫和模型來顯示出這一階段生物進化的眞理是切合當前需要的；並且對於勞動人民，這一部分的展品也具有破除迷信的啓蒙作用。至於「一般科學」這一名詞是比較地含糊的，究竟應當包括些什麼，而且就人民大衆的現有科學水平而言，如何能最有效地展出，都是値得討論的。可是爲了照顧到展覽內容的多樣性和趣味性，還照顧到籌備會中主要單位能充分貢獻出原有可以展覽的物品，所以決定設「一般科學」這一部門：包括物理、化學、生物、地理、心理五類基本的科學知識；另外加上電化敎育器材的佈置來調節觀衆的情緒。

關於展覽會的內容，在原則上作了如上的決定，比起一般的龐雜的展覽會來，多少是有些重心，可是事後從敎育的效果來談，還是展品太多，範圍太廣，重點不夠明確，觀衆接受不了那麼多的知識。

二、籌備會如何進行工作

籌備會於決定了展品原則之後，立即成立了三個設計委員會，「婦幼衛生」設計委員會由北大醫學院主持，「從猿到人」設計委員會由北大博物館專修科主持，「一般科學」設計委員會由師大理學院主持。這三個委員會分別辦理關於展品的設計、製作、繪畫、購置和徵借。前後只有一個月的時間，他們都能順利地完成了任務。

這種明確的分工是十分必需的，也祇有這樣才能推動工作。可是在實際情況中也不是沒有缺點的。因爲這次展覽會是集體主辦而由科學普及局領導，在領導方面顧慮到籌委會的團結問題，沒有成立統一的審查機構，於展覽之前，未能對於展品作一個通盤的審查，以致展品之中有互不一致的地方，例如關于婦幼的食品，在孕婦方面是用的勞動人民的營養品，在嬰兒方面却用了價値昂貴的營養品。也有一些圖表祇是表示某一單位工作成績的統計數字，與展品的問題無關。還有若干重複的展品，這都是因爲事前沒有統一檢查的緣故。可見籌委會在展品的設計方面是做到分工有餘而領導不夠。

可是另一方面籌委會的組織形式却多少能做到靈活運用的地步，全體籌備委員的會議祇舉行了一次，産生了常委會，通過了展品的原則和籌委會的組織系統，以後就一直由常委會領導進行。組織系統裏規定除了有三個設計委員會外，另有秘書處與總務、佈置、解說、糾察、保管、宣傳等六個組。在籌備初期祇有設計會和秘書處有工作，其他各組沒有指定專人。到了籌備中期，方才推定宣傳組由市文敎局和師大學生會負責進行。宣傳組在此次展覽會裏起了很好的作用。到了籌備後期始有專人負責總務、佈置、解說、糾察和保管的工作。這種組織機構隨着工作發展而逐步充實的原則是値得重視的；旣然不至於初期就確定一些掛名的工作者，也不至於臨時亂抓人。師大理敎兩院和電敎館的敎職員，以及學生會一起始就成立了服務團，有組織地參加工作，給展覽會以絕大的幫助。

三、會場的選擇與佈置

會場地址的選擇是一個展覽會成敗的關鍵。在北京，可以作展覽會場的地方是極少的，過去的一些展覽會多半是在中山公園裏的中山堂舉行，位在公園的深處，遠離群衆，而且公園又要買門票，因此觀衆的人數大大地受了限制。這次展覽會的會場是借用了北京師大附中的一個禮堂和十個敎室。它的優點是：地點是在北京春節遊人最多的廠甸，是接近群衆；場外有一片可容六七千人的操場，使得等待入場的觀衆不致擁擠；這是此次展出期間觀衆雖多而秩序良好的重要因素之一。籌委會本想在操場上搭蓋兩座大蓆棚作爲會場，一則臨街，二則容量可以增加，因爲氣候到防雨防火的問題，所以放棄了蓆棚的計劃。展出期間的經驗證明了放棄蓆棚的決定是正確的，否則就無法容納等待入場的觀衆。同時，不妨再把這一點小小的經驗强調一下：一個展覽會場的前面，應當有一片廣大的空地。可是附中的校舍本不是爲展覽會用的，敎室的狹小使觀衆顯得十分擁擠；而急待開學上課使會期不能多延幾天。這兩點成爲此次展覽會裏無法克服的困難。

十一個展覽室是這樣分配的：婦幼衛生部分在禮堂，從猿到人部分用三個敎室，物理、化學、生物、地理和電敎各用一室，心理部分用了兩個較小的敎室。在這種情況下，室內的佈置和展品的陳列系統甚難得合乎理想的。一般科學部分採用了商店櫃台式的佈置法，解說員站在連成長行的櫃台後面，台上放着展品，面向着觀衆解說，既可保管物品，又不與觀衆擠在一起，是値得提倡的一種佈置方法。其他兩部分因爲掛圖比較多，沒有採用這種佈置法。婦幼衛生部分是用木板加布隔成的小房子，擁擠的時候往往會把木板擠壞，表面好看而不大切合實用。

會場的室內與室外，裝置了兩條廣播網；室內的廣播網傳達領導方面的指示給解說和服務人員，室外的若干收音機做到了加强維持秩序，提高觀衆熱情的效用；並且經常廣播一些有關展覽內容的科學常識，使敎育的效果增强。

展品的陳列如何可以有重心有系統？這一個問題在此次展覽會裡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也可以說，失敗多於成功。「婦幼衛生」有十三個小單元，因爲是分別籌備的，排列的次序沒有方法表現出一貫性。「從猿到人」部分掛圖多於模型和實物，有些掛圖過份的學院氣，系統也欠明確。「一般科學」部分情形不一致，地理室比較有系統，從入口處的三球儀到出口處急待解放的台灣。物理室從電學、力學、光學三部門中挑出二十四個比較能結合實際的示範實驗，多少是有些重心。本來展覽品的重心和系統問題是一個最困難的問題，這一次的籌備時間那樣短促，而且又是第一次舉辦新型的展覽會，是無法達到理想的地步的。不過在總結經驗來說，不能不着重地指出這些缺點。

四、觀衆問題

這次會前對於觀衆人數沒有好好的估計是一個錯誤。最初唯恐觀衆太少，所以利用報紙、廣播、廣告畫、民敎館、電影院做了廣泛的宣傳，並且由文敎局動員了區文敎科替各區居民和成人夜校排定參觀日期。而在開始籌備的

時候，會提出了『爲工農兵服務』的口號。可是場地如此狹小，無論如何辦法，每天能夠容納的觀衆是難於超過九千人的，而事實上每日趕到場外想參觀的人數要兩三倍於這個可以容納的人數。『工農兵』的口號也不切合實際，據展期內觀衆成份的估計是：居民佔百分之五十到六十，工人與士兵二十到二十五，中小學生十五到二十，大學生及機關幹部五到十，農民三到五。籌委會並沒有主動地動員工人來參觀。

如何將有組織的觀衆，就是團體參觀和一般觀衆分別排列日程，是一件事先應當好好準備的工作。這一次因爲團體參觀和一般觀衆沒有分開日期，團體浪費了等候的時間，觀衆也表示不滿。

十二天的展出期間實際進場參觀的人數統計是九萬多人，接近十萬人，每一個人在場內參觀需要兩小時以上的時間，而有大部分人在場外等候到四小時；在風砂的空地上能有這樣堅持的耐心，實在是由於群衆求知慾的熾烈和覺悟性的提高，的確是令人感動的。這是會場內外秩序始終良好的主要原因。同時服務的同學能掌握原則，始終不懈，表現出全心爲人民服務的熱情也是保持大會秩序的要素。另外還有一點技術上的經驗可以報導。在每天的中午發給排隊等候的觀衆四五千入場劵，一方面控制了人數，一方面使觀衆安心，一方面使後來的人不致於強求入場。

籌委會編印了兩種小冊子，一種是關於婦幼衛生的知識，一種是一般科學常識。這兩種小冊子在會場內外以極低的價格出售，好些觀衆一面閱讀一面等候入場，收到了教育和安定的雙重效果。

五、展出期間的服務情形

在展出期間的服務工作可以分成四方面（廣播和宣傳工作在外）：一是向觀衆直接服務的解說員，二是爲大會維持秩序的服務員和聯絡員，三是担任警衛工作的公安人員，四是照料行政工作的秘書處（這裏主要包括總務和保管）。在十二天中這四方面的工作人員一共動員了一千五百人，每一個人都能忠實于他的工作。在服務的過程裏，表現出高度的熱情和認眞的態度，例如解說人員最辛苦，因爲有專業性，所以很難採用充分輪替的辦法，以致許多工作人員說得舌敝唇焦，到大會閉幕的時候，喉嚨嘶啞得說不出話來的人爲數甚多。而這次展覽會的特點之一，就是有衆多的分門別類的解說人員。服務員的負責同學，終日奔走在風砂之中，任勞任怨，表現出不折不扣的責任感。警衛同志也認眞切實，大會期間未有發生任何意外。秘書處的工作是瑣碎繁雜，這裏的工作人員是科學普及局派來的幹部，此次展覽會給他們以很好的鍛鍊的機會。在服務人員之中，有幾部分，尤其是糾察組，經常在晚間有檢討會，總結當日的經驗，佈置次日的工作。

可是在服務的過程裡，不是沒有缺點的。首先是解說和糾察的矛盾。（因爲糾察這一名詞表現得嚴重了一點，所以將担任糾察工作的同學稱之爲服務員和聯絡員。）觀衆於入場之後總願意多聽解說員的講解，而場外的觀衆又急于想入場，這種必有的矛盾引起了解說員和服務員的步調不能一致。服務員總是催促解說員精簡解說，而解說員一方面希望服務員幫助疏散觀衆，一方面又希望少放觀衆入場。隨着大會的進行，在展出的後幾天，兩方面合作的情形才改善了一點，不過始終沒有能完全克服。

這次動員的人數以參加服務股的最多，包括師大本部、二部，男女兩附中的一千二百位同學，有些同學年齡小些，而每日輪換，對于所要執行的任務，了解得不夠明確。

秘書處大體上能做到分工合作的程度，不過有些地方作風不夠民主，處理問題的時候不免偏于主觀。而有時爲了顧及情面或是其他原因，不能把持原則。服務股認爲觀衆應一律平等待遇，誰也不能優先入場，秘書處却開了好些次通融的門。這種不能協調的地方恐怕祇有利用一個星期日專請機關負責人參觀方才能解決。是值得再辦展覽會時，加以注意的。

大會的宣傳工作是做得相當成功的，不僅僅在北京起了教育的作用，同時也把展覽會帶到全國去了。可是把一兩件突出的例子充分報導之後，難免有誇大了展覽會的成就的偏向的。

六、全盤的總結綱要

（甲）成功和收穫

1. 此次展覽會在基本上可說是成功的，一共雖然花費了六萬斤小米，其中有永久性的成品、材料和用具却佔三萬多斤，消耗費佔二萬四千斤。大會的觀衆接近十萬人，每一個人在參觀之後，在科學水平上提高了一寸，教育的效果是不算大小的。
2. 參加工作的人員在思想上是多少有些收穫，進一步建立了爲人民服務的觀點，認識到群衆力量的偉大，體驗到與人民大衆結合的必要。
3. 這一次展覽會的經驗可以供給全國各地的參考，替普及科學工作增加了動力，提供了方法。

（乙）失敗和缺點

1. 計劃不夠周密，領導不夠認眞。
2. 展覽品的重心和系統還是欠明確。
3. 沒有進得了場的觀衆比參觀到的人爲多，而就是進了場的人也有走馬看花的毛病。
4. 費用的開支沒有做到精打細算的地步，浪費還是不少。

七、對于未來的希望

由這次展覽會裡觀衆的熱情可以看出人民大衆對於科學知識的要求是迫切的。我們從事科學普及工作的同志如何能夠隨時隨地滿足他們的要求，是一件十二分值得重視的問題。展覽會祇是一種臨時性的短期的教育武器，在今天可以大規模地廣泛地運用。另一方面永久性的長期的科學陳列館也需要籌備起來。我們相信，全國的科學工作者文教工作者是不會辜負人民的期望的。

（上接第二十八頁）

「可憐的人們，」李四光教授這樣說：「眞是太緊張了，地球的大小，星斗的數目，都要守秘密，甚至吃飯都要守秘密，因爲是在戰爭中，吃飯的問題關係着士兵的體力呀。」

在一個光明的世界內，把科學用來爲全人類造福，但到了黑暗的世界中，却把科學變了質。第二次大戰以後國際形勢根本改變，全世界的和平力量空前壯大，特別是中國人民斬斷了百年來帝國主義所加的鎖鍊，也大大影響了歐美的科學家，使他們知道，在社會制度沒有改變之前，科學事業仍然在歧途中，孤高自賞，自以爲關閉在實驗室中，超政治的現實，那完全是自欺欺人的。

四十年來不是一個短時間，李四光教授辛亥革命以後，走到學術的崗位上，他的革命精神却沒有停頓，他在地質學園地的創造也是革命的行爲。在五四以後，像他這樣爲科學努力的一批科學者中，他應當是首先被提出的人。他讚佩他所接觸到的中國科學院的朋友們思想轉變的迅速，他謳歌建立爲人民服務的觀點，他說：

「新中國即將轉入和平建設，全世界有良知的科學工作者，都在關心我們，他們希望我們以成功的果實，來鼓舞他們迎接美好的明天。」

李四光教授將在南京小作逗留就到北京中國科學院來服務。

挖出我的思想根源

雲映海

我出生在一個小資產階級的家庭裏。父親性情暴戾，色情。母親待人厚道，自與父親破裂之後，便把愛情和希望全部寄託在孩子們身上。對於父親，爲了他狠心的撇下母親，爲了他對於子女沒有仁慈，爲了他荒淫無恥地玩弄女人，我只有仇恨似的感情。對於母親，我懷着深深的同情；在青春時就給丈夫拋棄了的她，過着眼淚的歲月，一切爲了孩子。對於我的姊姊，她秉承了我母親的嫻靜敦厚的性格，我唯有感謝；她是影響我最深的人之一，我之能繼續上學到現在，沒給父親迫着輟學同他去做生意，是我姊姊起了決定作用的。

小時候，由於父親性情的暴戾兇狠，一向懾於他的威嚴的我，一直過着憂鬱的生活。父親的狠毒的鞭子和無端的咒駡，母親懷裏的愛撫和姊姊的慰貼，使我很早就學會了恨和愛。恨我的父親到了這樣的程度，我甚至恨他的朋友和逢迎他的親戚族裝；而愛我的母親呢，甚至對我的姨母和舅父我都有了偏愛。狹隘的感情像乳汁般的哺育着我。我的一向慣于「小圈子」的感情生活在這兒找到了根源。

父親的如寒熱病的要威、辱駡和恫嚇，使我的自尊心在很早就受到了損傷；因此小時候就怕見陌生的人，更不敢做一點冒險的事。膽小、孤僻、害臊、沉默、和我的情感緊緊地聯系在一起。『他是我的爸爸嗎？』每當夜半夢回，給厲色的父親吓醒來的時候，我常常在心裏這樣問自己。我的父親對我尚且如此，難怪我覺得我有充分的理由懷疑除母親和姊姊以外的其他一切人了。一顆不信任別人的種子在我心裏滋長了起來。十多年的光陰可以說是在幾個不同的「小圈子」中流過去的：小學時是在母親的懷抱裏；初中時受了「桃園三結義」的影響，和兩個小朋友結成了兄弟；高中的三年也是生活在幾個朋友中間。可是他們現在都比我進步得多了，常常來信督促我這不長進的朋友。

由於上面所說的對別人的懷疑、孤僻和「小圈子」作風，使我考慮問題非常主觀而片面。只看得見自己，以爲自己總是對的，別人則一無是處；或者見樹不見林，把問題的局部誇大爲全體。總是拒人於千里之外，自己「成竹在胸」之後，便像一個難攻破的堡壘似的，別人的意見常遭到我沒有理由的拒絕。但是，長久的舊社會的耳濡目染，使我變得「老成」多了；雖然心裏早已乾脆拒絕了別人，臉上仍然表示着有考慮餘地的神氣。『不坦白』，有人這樣批評我。的確，我的坦白率直似乎沒有超出過「小圈子」的範圍。可惡的「小圈子」！

我從小便愛讀小說，所以一直就愛好文藝。我的家鄉不算偏僻（在四川重慶附近），可也沒有接觸過什麼「兒童世界」之類的兒童讀物，所以小學時候唯一的精神食糧就是舊小說。沒在小學畢業以前，舊小說便已經唸得很多了。進中學以後，更是如醉如癡似地唸着「紅樓夢」。受過這本小說的影響的，恐怕不祇我一個人。唸着唸着，便隱約地感到書裏的人物就有自己的影子似的，同情着那一群可憐的聽人擺佈的小生物，吟着「滴不盡相思血淚拋紅荳」的詞句，眼淚便簌簌地落下來了。早先的憂悒，多愁善感，不能不是這些小說遺害給我的。與此同時，新文藝也開始接觸到了，而且有取而代之之勢。讀過不少魯迅、郭沫若、矛盾、曹禺、等作家的作品，從這些作品裏得到了不少進步思想的啟示，對人生也有了新的看法，感情上不再留戀着纏綿悱惻的兒女之情了。

不過新文藝雖然斬斷了我與舊小說的緣份，但並沒有減低我對舊詩詞的興趣。「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踪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仍是我喜歡的舊詩之一。我中學時之喜歡舊詩詞，曾被我自己解釋爲祇有在舊詩詞裏才有所謂「羚羊掛角」的境界。當高中畢業期近的時候，在一位朋友的紀念冊上看到了這樣的話：「朋友，沒有白晝的喧嘩，不會知道夜晚的寧靜；沒有見過繁星的天，你那會知道孤星的淒零；沒有嘗過痛苦的人，他也不會知道幸福的可貴，……當你發覺你自己是幸福的時候，你已走到痛苦的邊緣了。」多麼虛無，多麼不着邊際的話呀！然而我當時是那麼喜歡這些話，竟和這位原先不說一句話的幾近於陌生的人，不到幾天工夫就變成「莫逆之交」了！

從這些事實裏，可以窺見我當時的思想是何等的混亂和矛盾：對於新的沒有執着的熱愛，而對於舊的仍然在留連低徊。

在北京解放的前一年，一位朋友介紹了我一本著名的蘇聯小說──「鋼鐵是怎樣鍊成的」。書中的主人翁柯察金·保爾的一生深深地感動了我。這一段話我永遠也不會忘記：「一個人當他回首往事時他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因過去的碌碌無爲而羞恥，而在他臨死的時候也能夠說：『我整個的生命和精力，都已經獻給世界最壯麗的事業──爲人類的自由解放而作的鬥爭。』」當時的北京，反動派已成爲了甕中之鼈，在那樣的形勢條件下，這本書在我的思想上委實起了不小的進步作用。因此當時就成天盼啊盼的，巴不得立刻結束那黑漆一團的舊中國。

終於，解放的日子在意料中迅速地來到了。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三號上午十時光景，激烈的炮聲在清華園外驀地響起來了。不到兩天工夫清華園及其附近都變成了「真空」地帶。到十八號我們便成群結隊地去和解放軍「會師」了。這給全校的師生工友帶來了無可比擬的興奮，每個人都被捲入了學習解放軍政策的熱潮。當時的我更是給嶄新的事物刺激得滿腔熱忱，積極地學習，爲北京解放進城工作打下了基礎。在半個月光景的工作中，從實踐裏了解了人民政府的政策，對中國革命的性質也有了較深入的認識。可是當工作一結束，回到學校裏來的時候，小資產階級的革命熱情也就慢慢地低落下來了。我仍然逃回到舊的個人學習中間去，好像沒有發生過甚麼事似的。

在革命的隊伍裏，小資產階級最容易患冷熱病。作爲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我，上面所說的只不過是一個例子而已。這裏，我還想回頭再看看我自己。

解放前幾次較大的學生運動，如「抗暴」（沈崇事件）運動、「反美扶日」運動、「七·五」事件等，我都參加了，而且一次比一次的明確地意識到了這是振撼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有力武器。但是我並沒有將這些從實際運動中得來的認識好好地鞏固起來，所以當運動的高潮過去了之後，激動了的情緒也慢慢地平靜了下來，「我行我素」的本色又露出來了。

解放之後，舞台上所看到的秧歌劇，特別是「血淚仇」，地主的殘暴，農民的受壓迫與受剝削，鮮明的對照，使得我簌簌地落下了眼淚來，激起了我對地主階級的深刻的仇恨。又看到了強大的人民解放軍，他們一歇下來就給老百姓幹活，那種十分自然的爲人民服務的偉大精神，使得我見了他們就感到非常的醜恥，覺得自己眞是極端渺小。特別是在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的慶典上，使我看到了人民力量的偉大，懂得了是誰在創造歷史，感到了自己責任的重大。所有這一切，在當時都是那麼強烈地感動過我的，使我堅決地要求改造，爲人民服務。但等到日子一隔久

了，碰上了實際問題之後，便「依然故我」地把什麼都忘記了似的！

「小圈子」的感情生活、舊文學的影響、沒有理由的拒絕聽別人的意見、以及小資產階級的冷熱病，使得個人主義的思想在我身上的發展得到了有利的條件。解放前，在剛上了大學以後的一段時期，經常縈繞在我腦子裏的是我的母親、朋友和我自己。考慮一切問題幾乎都從他們和我自己出發。只要能夠滿足他們就是我的最大的安慰了。因此對別人的意見我常常感覺到是多餘的，拒絕一切的心理使我對別人漠不關心。解放之後，由於整個革命形勢迅速發展的影響，和在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的學習，基本上已改變了我的學習態度和學習方法；特別是經過了上學期半年政治課的學習，革命的人生觀和為人民服務的觀點是已基本建立起來了。但知識分子接受理論知識是容易的，實踐却困難，這是知識分子的特點。我也不例外，而且對於理論的了解似乎還不落人後，讀過了不少的革命理論書籍，跟朋友們也解決過不少理論上的問題，因此我常常陷於自滿和神氣十足的泥沼裏。自高自大聯繫着虛榮心，使我歡喜在朋友們面前賣弄口舌，一心想着語驚四座，因而有時誇大一件事甚至到了說謊的程度。譬如在剛解放，學校的盟（新民主主義青年聯盟）公開以前，一位朋友在我的誇誇其談的煙幕下，不加懷疑地說我是一位盟員，當時我便很自然地給了他一個肯定的回答，而且還在臉上表示出這位朋友「頗有眼光」的神氣。再舉一個例子吧。當我去年在北京大中學生暑期學習團的時候，在青年團的同志們來發動我入團之前，我便有入團的要求了。但是心裏老是還着，想：『自己申請入團總是不怎麼體面的事情，同志們來發動我入團總是覺得我很不錯才來發動。』可恥的虛榮心！

在經常的政治課的學習中，在組織不斷的幫助下，在整個革命形勢發展的影響下，漸漸地學會了從階級看問題，初步地建立了階級觀點，也部分地克服了主觀主義，給班上的同學辦事時自動地和他們去商量，團裏的號召和分配給我的工作，也不再感覺到是一個沉重的負担了，組織性和紀律性的修養漸漸地培養了起來。但是否思想上已沒有問題了呢？個人主義是否已完全為集體主義所代替了呢？一個明顯的例子給我自己找到了回答：當我考慮到將來畢業以後的問題的時候，「服務條件好」，或者說「位置第一」，在我腦海裏還是佔着壓倒一切的優勢。恐懼着將來被分配到新疆西藏去；『留在北京吧』，一直懷着這樣的期望。為什麼想留在北京呢？依我自己向同志同學們的解釋，說北京是首都所在，人文薈萃之地，將來畢業出學校以後，也隨處可以學習。但同志同學們則給我挖出了一個『向上爬』的根。因為按照傳統的看法，京畿所在之地，「向上爬」的機會畢竟是比較什麼地方都多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觀點」，雖然經過了半年政治課的學習，坦白的說，仍然沒有建立起來。

寒假快到的時候，傳來了動員同學參加北京郊區土改的消息。最初我還有些猶豫，可是一想到錢俊瑞部長的話「土改是改造知識分子最好的環境」，我便毅然報名參加了。

二十天光景的土改工作中，時間雖然不算長，可是收穫却遠超過了二十天獃在學校圖書館裏所獲得的。我被分配在屬於石景山區的一個小村裏。石景山是個工業區，一般的講，土地還不算太集中。特別是我工作的這個小村，既無住在村子上的地主，富農也只有絕無僅有的一戶，而且地主富農的土地早在去年春天就調劑好了。最使我們感到不景味的，是在我們到該村之前老幹部們早就把階級劃分好了。在這樣的客觀情況下，小資產階級的革命熱情又受到了損傷。『調換我們的工作地區啊！』我幾乎是帶頭地嚷了出來；把到工作崗位之前石景山區委告訴我們的話「一切為了工作，服從組織分配」的話，幾乎扔到九霄雲外去了。幸好在老幹部們的幫助下，情緒才慢慢地安定了下來。可是工作一上手（譬如統計資料的工作吧），好表現、好虛榮的惡魔也就作祟起來了。放不下大學生的架子，心裏懷着鬼胎，總是害怕着老幹部和村幹部笑話我們，一接觸到工作就想拿出成績來，性急得要命，深怕落人議論的口實。感情上和老幹部村幹部還保持着相當的距離，沒有把他們當做一家人看待。可是就在最初的統計資料的工作中，老幹部的虛心的態度和誠懇的幫助教育了我，使我樂於請教他們，工作效率也提高了，整理數字時不必每一個數字都要在一大堆資料中去找，一問他們就知道。在工作中，使我和老幹部村幹部（村幹部主要是翻身的積極貧雇農担任）的距離拉近了些，心胸也變得光明磊落些了。第三天，他們就親熱地管我叫「小雲」了。

我們整個土改中的具體工作是整頓農會，建立工會和婦代會，辦成人識字班和婦女識字班，建立黨團，宣傳咱們人民政府的土改政策。這是一個澈頭澈尾的群眾工作，必須發動群眾來做。但如何發動群眾呢？我們從老幹部那兒學得了串門子的方法。最初老幹部領着我們到老鄉家去，後來我們就自己分頭去了。

在深入群眾的許多訪問中，有一家的訪問給我的印象最深。

一天，我和工作組一位同學去訪問了一位最苦的貧農。窄窄的屋子，一個炕兩條凳和一個櫥包括了他的全部傢具。他告訴我們解放前他種了一個住在北京城裏的地主的三畝地，給地主交租以後已剩餘無幾，『現在可好了，』他接下去說，『共產黨人民政府真是為咱窮人想啊，這三畝地可回到我手裏來了。』解放前他的糧食不夠吃，靠上門頭溝走窰（即揹煤）來幫補。『走窰苦啊，』他眼睛裏閃爍着苦痛回憶的光芒，『解放前大部份是私人的小礦，設備不好。冬天，從礦底下把煤馱上來熱得直淌汗水，僅僅披在身上的一件單衣都給濕透了；可是外面的雪却落呀落的，上得礦來直冷得人哆嗦！頭四五年我還是一個精壯的漢子，可是現在，差不離就剩一把骨頭了，……』停停，瘦削的臉上驀然透出了紅暈，他興奮起來了，繼續說下去：『現在因為私人的小礦太危險，政府給封了，礦都是國家的，設備也好了。我本來還想去走窰，可是因今年（指去年）的水旱災，很多災區的老鄉們都逃難到這兒來了。我響應了政府對本地老百姓的勸告，不再去走窰了，好讓受災的老鄉們也有個活路。天下農民是一家呀！共產黨眞好啊，是咱窮人他都照顧到，……』

「天下農民是一家」，多麼深厚的階級友愛呀，我敢說上十堂政治課也感受不到這樣的深切。同時，也深深感覺到小資產階級的卿卿我我的感情之可恥，我下了決心扔掉這包袱。

十八天光景，我們的農會已整頓好了，工會和婦代會也建立起來了，成人識字班和婦女識字班也成立了，黨團的組織亦已基本建立了起來。當我們和老鄉們告別的那天，一位老鄉緊緊地拉住我的手，顫聲問：『甚麼時候再來我家串門子？』我深深被感動了，眼眶裏有着潮濕的感覺。

×　×　×

根據上面所暴露的一切，同志同學們幫助我分析，指出了下面三個思想根源：（一）個人主義。這是主導思想。使我好虛榮，「向上爬」，缺乏嚴格的組織性和紀律性的修養；（二）主觀主義。使我一意孤行，毫無理由地拒絕聽別人的意見；（三）溫情主義。使我陷入「小圈子」的泥沼。對革命的態度不嚴肅，犯冷熱病。

我給這三個魔鬼糾纏住快二十年了。今天算是一個清算的開始。這是一場殊死的鬥爭。魔鬼們，不是你死，就是我給你毀了！我既然敢暴露你們，我就有勇氣和你們作鬥爭！今後我決定要更加重視政治課，掌握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聯繫實際，不囫圇吞棗，在組織的幫助下，攻下魔鬼們為我的進步而設下的每一個堡壘。

——四月三日春假改寫於清華園。

清華是怎樣進行學習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的？

謝逢我

經過半年「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的學習，在清華基本上是成功的。作過一次思想領域中的解放戰——「總結」以後，雖未必個個成爲了堅强馬列主義的鬥士，但無疑的，我們已經開始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用唯物的觀點、辯證的方法來觀察、分析、處理具體問題，爲人民服務的人生觀更沒有什麽可疑的了。尤其參加「土改」歸來，在思想意識上無異做了一番「加固」的工程，因此本學期在我們學習「新民主主義論」的時候，我們有着許多優良條件，這些條件是由于半年來摸索所創造的。譬如說：『我們不會再提出：我搞我的業務，學政治課有啥用呢？』類似的疑問，同時，學會了理論聯系實際，不像上學期起始，硬板板的教條主義，極一時之盛，同學，不明白如何把自已擺在裏面？此外，怎樣加强組織？怎樣搞好自學……大都茫無頭緒。大課委員會根據同學們反映的情況，反覆研討，從實際中吸取了一些經驗，這些經驗對于今年的大課又是一大幫助，所以，無論由那個角度看，我們有充分的信心，完成「新民主主義論」的學習。

政治課，我們既已肯定應該學、必須學，然而爲什麽要學習「新民主主義論」呢？錢俊瑞副部長某次報告中說得非常明確：「我們要從上面所說的（無產階級）立場、（唯物主義）觀點、（辯證法）方法，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眞理與中國革命實踐結合起來，經過中國人民二十多年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的奮鬥已有很好的結合，其主要表現是毛主席的全部思想：『新民主主義論是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結合最好的典範。』因此，這學期要學習新民主主義論，要更進一步根據已學得的立場、觀點、方法來看中國革命與建設的規律。」換句話說，我們要用去年建立的幾個基本觀點，來學習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最高度、最完整的結合——毛澤東思想怎樣形成。也即是學習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進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解放鬥爭中，明瞭中國社會發展的規律。這樣，我們的立場、觀點、方法要在具體問題面前考驗了！

第一講是由何幹之同志講「中國革命的歷史特點」。按照中國社會的性質，說明中國革命必須分兩步走，並且不是舊民主主義的革命而是新民主主義的革命。確定了這個前提，我們繼續學習第二個題目：「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請到胡華同志替我們作報告，他把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分爲四個時期：（一）五四運動到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北伐戰爭）時期（一九一九——一九二七）。這個時期包括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發展，以及第一次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與第一次大革命。（二）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十年土地革命（一九二七——一九三七）。這個時期包括北伐戰爭失敗後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中國共產黨進入農村，領導農民進行土地革命，反革命的「圍剿」與革命的反「圍剿」的鬥爭，以及國民黨反動集團的賣國內戰政策，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的抗日救國鬥爭。（三）中國民族解放戰爭時期——抗日戰爭（一九三七——一九四五）。這個時期包括：A抗戰中戰略退却階段（一九三七年七月——一九三八年冬）。B抗戰中的戰略相持階段（一九三八年冬——一九四五年八月）。C抗戰中的戰略反攻階段和抗戰的勝利（一九四五年八月）。（四）日本投降以來中國人民解放戰爭時期（一九四五——一九五〇）。包括：A日本投降後蔣介石的賣國內戰政策與中國人民爲爭取和平民主而鬥爭。B人民解放戰爭的發展與偉大勝利。C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發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報告內容中着重地指出：（一）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乃是中國人民在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行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以及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而解放自己的歷史，也就是說，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首先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歷史。（二）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乃是毛澤東思想、毛澤東道路的發展與勝利的歷史。毛澤東思想、毛澤東道路是在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基礎上生長起來的，經過了歷史的一再考驗得到證明的。（三）中國新民主主義的歷史乃是四次偉大的革命戰爭的歷史。最近三十年中，中國共產黨在與中國廣大農民以及城市小資產階級群衆的密切結合中，在與中國資產階級聯合與鬥爭中，在創造與建設偉大的革命根據地——解放區中，連續領導了四次偉大的革命戰爭。

聽了胡華同志的兩次報告，同學們思想上得到了很大的啓發，因爲已往受過國民黨歪曲歷史的宣傳，腦袋裏多少存在了一些「正統」的觀念，黑的認作白的、白的認作黑的顚倒看法也是極爲普遍的。像王同學說的：「五卅慘案的顧正紅，現在我才知道也是共產黨員，難怪他有那麼堅決鬥爭寧不屈服的精神！」張同學說的：「西安事變，蔣介石說什麽『精神感召』了張學良，那時我的確覺得他有點骨氣，誰知撒的謊是謊，看見捉他的人來了，只管打抖擻呢？」劉同學說的：「國民黨老是强調五四運動僅是一個新文化運動，把個胡適捧出來，眞正的政治意義倒抹煞了，原來爲了遮掩進步力量不得不如此！」

我們很自然地展開了自學。大課委員會指定本節的參考書大半是毛主席的著作，胡繩編著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講話（初稿）」也極受同學們的歡迎，大課委員會購有兩百多本陳列在閱覽室。「精讀毛主席的著作」在我們中間掀起了高潮，「清華學習」爲了幫助同學們閱讀，特地撰文介紹毛主席的著作，指出每一本書中的重要章節和科學的預見，這樣一來，同學們看書就不致抓不着頭腦了。而且由此深深體會到了毛澤東思想，正如王同學所說：「新民主主義論在解放以前，我看過兩遍，沒看出個大道理來，現在，也許因爲各方面的條件不同，精讀之後，我覺得毛主席說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包含着眞理！」又如李同學所說：「我學了半年唯物辯證法的法則，雖全盤接受，但苦于不知從何運用？看了『論持久戰』，我心竅開了：毛主席用全面和發展的觀點分析抗日戰爭唯有堅持持久戰才能獲得勝利，駁斥亡國論與速勝論者的錯誤思想，還不是由于掌握了辯證法！」

另一方面，自學也發生了偏向，同學們看革命史的時候，只是當作一部歷史故事來讀，走馬看花，一個晚上就

翻宗了「人民公敵蔣介石」，也不記筆記，認爲無此必要。儘管看的對多，而且津津有味，但是一到討論，沒有問題可提，「反正那些都是事實，沒有什麼懷疑！」眞的沒有懷疑麽？依據馬列主義客觀的發展，也是不可能的。我們過去領受統治階級的舊教育太深了，那些唯心的、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掩蓋了歷史發展的規律，況且反動派專事揑造歷史，抹煞事實，在我們年青一輩不是完全沒有收到效果的。縱使表面上接受，實際未必眞「通」，主要還是由于不聯系自己的思想，站在第三者的立場看革命的歷史，所以「去年的大課爲了改造思想，今天的大課爲了學習革命的理論和知識」的思想也產生了，一部分同學以爲既是學習革命理論和知識，只要多念幾本書便足矣。從字面上去了解革命，單純的爲追求知識而滿足，知道了一些革命的過程和步驟，却忘記了其中的血肉。然則怎樣聯系實際呢？費孝通先生告訴我們使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他說：「只要我們肯暴露思想，善于分析過去的想法，就可以發現我們頭腦中還存有許多不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的思想。」並說：「批評和自我批評好比洗臉，每天都要洗洗，否則就會不乾淨！」

問題是有的，而且相當多。「五四運動與革命有啥關係呢？」「北伐戰爭中，共產黨爲什麼要幫國民黨！」「土地革命可以不用暴力嗎？」「蔣介石在抗戰幾年中有一部分功績。」：各種各樣的思想反映出來了，在小組討論會上爭執起來，彼此不肯罷休。這有它的客觀原因。問題容易牽涉到事實方面，二十歲左右的人，至少抗日戰爭與民族解放戰爭，耳聞目睹，體會得較多，常常各有偏見，却放棄了立場。還有一種偏向是看問題從空想出發，同時過分重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例如：「假使陳獨秀不犯錯誤，革命是否能提早成功？」「要是沒有蔣介石，又有誰來反革命？」……一般說來，同學們討論革命策略問題，非常感覺興趣，對于毛主席思想更是敬仰不已。

我們討論的問題中，最普遍、最起勁的要算領導權的問題：「北伐戰爭爲什麽是共產黨領導的呢？」「五四運動與無產階級不相干呀！」「抗日戰爭不是國民黨領導的麽？」這是一件有趣的事，知識份子最關心「領導權」，不管「革命」也好，「運動」也好，別的擱在一邊，首先要問：「是誰領導的呢？」由「領導是誰」判定「革命」或者「運動」的本質。對于北伐戰爭和抗日戰爭，意見容易取得一致，事實證明：假若不是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共產黨的領導，決不能獲得勝利。對于五四運動的領導權看法就很紛歧了，很多人認爲只是知識份子搞起來的新文化運動（國民黨的教科書上提到「五四」，把胡適吹得極高，李大釗、陳獨秀等則順便一提）。還有人機械地把「五四」那一天群衆攡毀趙家樓叫作「運動」，不了解這是新思想長期醞釀在文化上的表現，不能孤立地把它看作一個文化的或群衆性的運動。這些具備新思想的知識份子，像李大釗陳獨秀等，後來成爲中國共產黨的創始者，對馬列主義在中國的萌芽，起過不小的醱母作用。

至于五四運動究竟是，那個階級領導？顯明的有着兩種不同的看法：一是同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領導的；一是同意無產階級領導的。前者以領導五四運動的人物大半屬于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爲理由，後者覺得當時領導者已經有了無產階級的思想，雖然無產階級的隊伍尙不够壯大。爭辯隨着開始了，有人提出先將「領導」兩字的涵意弄淸，「什麽才是領導？」見解也不一樣，有的說只要看那方面的人數多，有的說只要看那方面的力量大，愈扯愈遠，討論的重心却轉移了。那天湊巧費孝通先生參加我們的班會，他給我們的解釋是：「領導不領導倅看外表形式不够的。抗日戰爭中，國民黨的軍隊不能不算多，力量不能不算大，但是我們能够承認抗日是國民黨領導的嗎？領導的意義應該是指出一個正確方向來！『老農趕車』，老農拿着鞭子趕着騾子往前拉，他就是這個車的領導者。」

爲了證明李大釗等在五四時代在中國思想界上的影響，我們的班長吳景超先生花了五個鐘頭，把當時傳佈新思想最有力的「新青年」雜誌，從創刊到停刊看了一遍。李大釗和胡適的思想恰好成爲鮮明的對比：一九一八年十月，李大釗發表了一篇「祝歐戰勝利」的講詞，明顯確地指出資本主義必然失敗，勞工必然勝利這一科學規律，往後，他寫的文章都是與馬克思主義有關的。胡適呢！只有一二篇涉及思想的作品，「多討論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便是其中一篇的精髓，其餘的文章都是談文學，因爲他覺得「十篇剩餘價值不如一篇研究有興趣」。這種往客觀找證據的方法，可以幫助解決問題，同學們不像對「五四」的人物有了一個新的認識。並且對「誰在領導」也不會模糊了。由于我們思想方法有毛病，馬列主義遇到具體問題不能運用自如，所以討論時繞了圈子，不過却是有代價的。最後，我們的結論贊成胡華同志的說法：「五四運動在其開始是共產主義的知識份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他們是這運動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統一戰線的革命運動。」「五四運動發起了中國新文化革命，打倒幾千年來根深蒂固的封建舊文化，創始了新民主主義的新文化，這個任務不是在資產階級領導下進行的，而是在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份子領導下進行的。」

學習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史，我們知道今日革命的完全勝利，並非偶然，更不是輕微易舉的事，這是三十年來無數革命先烈流血犧牲、英勇鬥爭而得來的；這是毛澤東思想——主要聯合農民的統一戰線，團結以蘇聯爲首的國際友人——正確地引導而得來的；這是因爲有一個馬恩列斯的理論武裝的採取自我批評的聯系人民群衆的中國共產黨而得來的。我們過去許多糊塗的觀念，現在經過了一次大洗刷，使我們看淸了歷史的眞面目——誰是革命？誰是反革命？懂得了歷史的必然規律，我們只有更加强鍛鍊自己，鞏固和發展革命勝利的成果！

（上接第二十五頁）

等了封建統治，樹立了農民的優勢。這些農村以農民代表會議普遍地代替了原有的鄉村政權，且爲領導和推動農民運動的主要組織形式。完成土地改革中農村，出現了一片活躍新生的氣象。農民爲了增加生產，鋤麥子和耕秋地的極爲普遍，這是往年所沒有的。葉縣一月份統計，全縣麥地已有百分之九十三鋤過；秋地也已耕了百分之八十七。除了積肥，家家戶戶都新修了厠所，村裡拾糞的人比過去增加了一倍到幾倍；在這些農村中走過，你可以看見每家門前都已經積成了一個大糞堆；臨汝縣吳營村的農民說：他們要使每畝耕地在今年至少增加一倍肥料。農民買耕畜和農具的也很多，臨汝縣的一半地區從去年十二月以來就增加了七百六十七頭耕畜。農民爲了省下糧食買耕畜，他們就從事副業生產來增加收入。這樣，寶豐、郟縣、魯山等縣的農村中，手工紡織、開礦、鑄造農具等副業也發展起來了。現在，臨汝等七縣的農民，正在普遍建立自願的農業勞動互助小組，和集資建立供銷合作社。另一個現象是農民的文化要求普遍提高，特別是青年農民和農婦，他們普遍要求識字讀書。據寶豐縣的不完全統計：去年冬天就開辦了四十五處冬學，入學青年男女達四千多人。郟縣也增加了三十二個青年婦女的識字班。河南的土地改革後的農村，正朝向着新中國的經濟建設高潮和文化高潮。

記半年來全國各項產業工代會的召開

觀察記者

全國性的產業工會

工人階級是國家社會的領導階級與主人。工人階級首先帶頭來執行恢復生產的新任務。

去年十月，東北局及工業部頒佈了一個重要指示與決定，其中同時提出了要在各工礦企業部門迅即展開一個群衆性的創造新紀錄運動，「以便在這個基礎上達到定額管理，實行成本計算，並改善管理制度與管理方法，爲經濟核算制與進一步提高生產力打下初步基礎。」又說，「這是目前推動我們經濟建設工作前進一步的基本關鍵，也是東北經濟建設高潮的起點。」

今年四月天津工業局也號召公營各廠推行大連的進步經驗，建立十大定額（定產量、定品質、定工時、定工員、定技術標準、定機器台數、定材料價格、定原材料量耗用標準、定費用）新管理制度（包括七級工資制、超額獎勵辦法，及建立嚴格檢查制度，規定成品的標準規格等），發揮工人階級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中華全國總工會在去年年底發出了「關於在最近半年內建立十個全國產業總工會的通知，」要求各地方工會在本年五月以前正式建立起來。通知中說：

「我們工人階級的群衆組織——工會組織，過去長期處在分散的游擊戰爭的環境中。雖然也是按照產業的原則去組織工人的，但不得不以地方爲單位去建立工會的組織。……

「現在全國各重要產業部門及文化教育部門，在中央人民政府之中，均已有了全國統一的行政管理機關，而且進一步即將有全國統一的經濟計劃，生產計劃，管理制度，工資待遇辦法等等。這樣必須要有全國各產業部門統一的工會組織，方可集中全國工人階級群衆的意見，並統一其爲生產建設而努力的行動，發揮工人階級及其工會組織，對於生產建設偉大事業的貢獻；也才便於按照各個產業部門的特殊條件去進行工人階級的政治文化，技術教育，更有計劃地提高工人階級的覺悟程度與文化，技術水平；同時也便利於研究及規定全國各個產業部門統一的工資制度與職工福利待遇辦法。」

五個月來，這個偉大的號召逐步成爲事實，每個會議的基本內容是以下列三項爲中心來召開的：

一、生產問題：應我出本產業當前生產中必須解決和可能解決的重大問題，加以討論與解決。

二、集體合同問題：各產業部門均應由總工會代表全體工人和職員與行政主權機關簽訂該產業部門的統一的集體合同。其內容依準備的程度及客觀情況而定，能夠規定比較全面的勞動條件者，則全面規定之，一時不能完備者，可先擇一兩個可以統一規定的問題規定之。包括有私營單位的產業部門的集體合同，可先規定一個一般的總的集體合同綱要，而綱要所規定的統一原則下，再分別按照各地各廠情況具體規定之。每一代表會議結束，工會正式成立，即應與該產業主管簽定集體合同。

三、工會組織問題：在代表會議中應通過各該工會組織章程並製定工會基層組織方法。

海員·紡織·煤礦

全國海員團結起來，厲行節約，克服困難，加強運輸，協助人民解放海南和台灣，是當前海員的任務。這一個任務，在去年十二月十八至二十七日閉幕的全國海員工會代表會議上提了出來，並通過了關於組織問題，訂立集體合同問題，設立海員俱樂部和關於出版海員刊物，訓練海員工會幹部等項決議。

李立三在會議講演中指示，建立海員俱樂部是組織海員工人的重要方法之一，希望各地普遍建立；組織民船運輸公司是發展航運，組織民船工人最好的辦法，根據自願兩利的原則逐漸推廣這個組織。劉寧一作中國海員與國際職工運動的關係的講話。朱學範指出中國海員是有光榮的歷史的，前途是無限的，他們將在中國未來建設中發揮極大的力量。現任燃料工業部長陳郁，是老海員工人領袖，他也出席講演。最後劉子久號召全體代表把這次的會議的決議貫徹下去，並要在三個月後作出成績來。實現一九五〇年全國海員工人的任務！

海員工作委員會主任劉達潮宣佈會議勝利閉幕後，各地代表紛紛響應中央人民政府號召，踴躍認購人民勝利公債四八七九〇分。上海廈門各保證萬分，東北保証八千七百七十分。

中國海員工會籌備委員會即日開始工作，籌備在五月間舉行全國海員工會代表大會。

全國紡織工會代表會議今年一月六日開幕，十月閉幕。這次會議的任務是籌備召開全國紡織工會代表大會，建立系統的中國紡織工會的組織；從思想上、組織上準備迎接政府恢復與發展紡織工業的計劃，並保證完成與超過計劃。工代大會準備在七月中召開。

紡織工業部副部長錢之光說明目前中國紡織工業的設備和現狀，他認爲在三五年後，現在的機器設備將不能供給全國需要，紡織工業將要大規模擴充，紡織業的職工也將大大增加。他號請全國紡織工人們協助恢復和發展紡織工業。

天津中紡二廠工程師張渙卿在報告中指出依靠群衆的重要。他說本廠每件紗用棉從過去的四一〇斤減爲三百九十多斤時，行政上認爲已無法再提出節約的要求，但經發動工人討論的結果，去年十月至十一月兩個月中共節省了近一百萬斤玉米麵的材料，折合人民幣十億元。

這次會議中通過了關於生產工作、公營工廠管理民主化、集體合同、組織問題、加強和發展職工文教工作和廢除搜身制的決議，及通過向紡織工業部作改革工資制度、向人民政府作建立失業救濟基金的建議。

朱德副主席在閉幕會上勉勵全體代表們領導全體紡織業職工，實現爲國家累積資本的任務，要帶領職工加強學習，掌握新的生產技術，組織起來，以共產黨爲中心加強工人階級的自身團結，進而團結一切勞動人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建設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

全國煤礦工會代表會議一月二十二日開幕，二月一日結束，參加的有各大煤礦代表四十三人。

這次會議集中力量討論了五個問題：（1）依靠工人貫徹管理民主化，搞好生產；（2）廢除把頭制；（3）關於加強安全問題的決議和煤礦工會安全監察員條例；（4）煤礦工會兩個組織問題的決定；（5）開展文化技術學習運動。

在會議中李立三作了一次關於管理民主化問題的報告，由燃料工業部陳郁部長作了一次工會幹部要有生產觀點的報告。會議中又通過全國煤礦工會籌備委員會的全體名單。定期召開代表大會。

搬運·鐵路·軍工

全國搬運工會代表大會一月二十八日開幕，二月六日閉幕。這次大會最重要的是決定兩件事，第一，是討論研究澈底消滅碼頭運輸裝卸事業中把頭、幫頭、包工頭、腳行」的封建統治、封建剝削等城市的封建勢力，達到貨暢其流，運價合理的目的。第二，是選舉產生中國搬運工會全國委員會，把全國搬運工人組織起來。這兩件事，一件是政治任務，一件是組織任務；前者業已用命令實現了。

這次會議是中國搬運工人歷史上的第一次全國性的集會，全國有四十九個主要城市的搬運工會代表九十六人參加。過去搬運工人在社會上的政治地位非常之低，沒有人看得起，今天不同了，也和其他工人群眾一樣，社會政治地位起了根本的變化。除了討論消滅封建勢力，教育本身以外，向各地人民政府建議成立搬運公司，並代表工人向搬運公司訂立集體合同，建立勞動合作社與消費合作社。逐漸改善我們的交通運輸工具，舉辦搬運工人的死傷殘疾的勞動保險工作，加強文化技術教育，訂立勞動紀律，樹立新的勞動態度。逐步均將努力求其實行。

「我們已不是被帝國主義封建勢力與官僚資本主義所壓迫剝削之下的奴隸，而是成了國家社會的領導階級與主人，我們可以自由用我們自己的勞動來創造我們將來的幸福生活。」

全國搬運工會代表大會在二月六日閉幕，選出了中國搬運工會全國委員會，並通電向毛主席致敬，表示願担負起新中國經濟建設中所給與搬運工人的任務。大會通過了提交中央人民政府的頒佈搬運工人勞動法規的建議和中國搬運工會章程。

中國鐵路工會全國代表大會，在「二七」二十七週年紀念日開幕，十二日閉幕。中國鐵路工會即宣告成立。

在大會開幕時，李韻伯致辭中指出鐵路工人必須保證中央人民政府鐵道部一九五〇年運輸修建計劃的實現。李立三指出四十餘萬鐵路工人組織起來。朱德副主席勉勵鐵路工會組織工人，努力學習蘇聯關於管理鐵路的先進經驗，辦好人民鐵道。「二七」老工友梁永福、毛澤東號機車司機長將等勞動英雄李永、東北鐵路勞動英雄階振東、「一九三九」號機車司機長李永祿等一致表示決心保證完成鐵道部一九五〇年計劃。

大會原則上同意全國鐵路總工會籌委會負責起草的中國鐵路工會章程草案，並由新選出的全國委員會迅速進行修改，由全國總工會批准。大會又通過在全國鐵路開展合理化建議，訂立集體合同，建議政府實行全國統一的勞動保險暫行辦法，推廣鐵路職工互助辦法及關於鐵路職工教育的決議。

中國鐵路工會全國委員會在二月十二日下午即舉行第一次全體委員會議，推選人選，開始工作，由李韻伯任主席。

全國軍工工會籌備委員會已正式成立。由三月二日舉行的全國總工會第二十三次擴大常委會議，批准了各地推選來京的籌備委員，即主任賴國強，副主任賀瑞林（兼組織委員），李鑫德（兼生產委員），工資委員陳乃康、楊萬宏，組織委員劉賓俊，生產委員袁仲益，勞保委員汪濤、高懸林，文教委員華玉琨（兼秘書長）秘書周明。該籌委會已分成小組，開始工作。

郵政·電信·其他

中國郵政和電信工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十七日開幕，三月二十七日閉幕。會議代表一致通過了中華全國總工會提出的關於統一全國郵政工會和電信工會領導機構的決定，也通過了保證完成中央人民政府郵電部關於一九五〇年全國郵電事業生產任務的決議。正式成立中國郵電工會。

會議期間曾分別通過了關於郵政暫行管理民主化，關於工時工休及勞保暫行辦法，關於在電信企業中逐步簽訂集體合同，關於在郵電企業中提倡和開展合理化建議運動，以及關於加強郵電職工文化教育等決議。

在大會閉幕式中，朱學範部長號召郵電工人團結一致，提高工作效率，開源節流，減低成本，克服當前困難，完成一九五〇年的生產任務。劉子久部長號召大家把這次大會的決議變成行動，要言行一致，爭取更大的勝利。各地代表在講話中，一致表示要把大會決議和首長報告傳達給每一個職工，並貫澈執行。

在籌備中的建立機構會議，尚有不少。據總工會公佈，全國性的產業工會除鐵路、郵電、電訊、紡織、煤礦、五金、電業、食品、店員、搬運等單位。總工會在二月二十一日至三月三日召開了十大城市工會生產部長會議，三月二十五日，召開了全國工會組織工作會議。生產部長「會議擬出四個草案：（1）各地區各產業總工會生產部的任務與工作範圍；（2）工廠與車間生產委員會的組織與工作；（3）勞動公約；（4）國營公營企業師徒合同實施辦法。會議中並就如何改造舊企業、私營企業中改進生產等問題，廣泛交換了意見。

現在用李立三二月二十八日在生產部長會報中所講的一段話作為本文的結束：

「生產工作是工會的中心工作。把舊的官僚資本主義企業改造為新民主主義的新企業是改進生產，發展生產的主要條件。而實行工廠管理民主化，統一各種制度，是改造舊企業的中心環節。

「東北因解放較早，舊企業基本上經過改造，所以工會生產工作的當前任務是如何將新紀錄運動提高一步，按產業訂立集體合用，由超額獎勵工資制走向全面計件工資制，並在此基礎上組織與發動全面性的生產競賽運動。

「關內地區解放較晚，舊企業機構雖有些局部調整，但基本上仍是舊的機構、制度，沒有大的改變。當前的中心工作，是有計劃地逐步地改造舊企業問題。同時應根據企業具體情況，以工廠為單位，組織生產競賽，開展合理化建議，為全國生產運動打下基礎。

「工會也須注意私營企業中的生產工作，因為生產發展是工人階級最大的利益。地方工會生產工作應以工廠基層組織為重心，生產部必須加強對基層組織的領導。」

當這全國財經情況好轉的開始，工商業調整的時期到來，工會工作對於生產作用更為重要，工人階級正以國家主人翁資格領導四個階級，五種經濟克服一切困難，渡過難關。

（上接第二頁）

決定論是講不通的，並且是有害的。

去年十一月，代表我國科學工作者參加蘇聯巴夫洛夫百週年誕辰紀念會的馮德培氏（前中央研究院醫學研究所所長）回國抵滬，上海科學工作者慶祝十月革命紀念時，請馮氏報告關於蘇聯的科學建設和一般觀感，他說明蘇聯科學在社會主義的建設中，有了輝煌的成就，決不是像帝國主義國家以科學為統治人民，準備戰爭的工具。

（五）結語

從這一連串的事實中，可以看出上海的自然科學工作者們，怎樣從狹隘的個人主義小圈子裏解放出來，和廣大人民站在一道，向着一個目標邁進；雖然他們在某些程度上顯得不夠，然而，總的方向是完全正確的。迎接祖國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高潮，正有待於各方面一致的努力，作為建設力量的一環，自然科學工作者在上海解放後的一年中已有了良好的開端，也一定會有輝煌的成就！

× ×

記河南農村的土地改革

穆家軍

河南省的兩千多萬農民，正在從農村中古老而殘酷的封建制度下解放出來。他們在農民協會的率領下正依法沒收和分配着地主階級所佔有的大量土地。

河南是黃河中游南岸的一個豐饒的省份，大部分是廣袤而肥腴的黃土平原。全省面積十四萬零九百三十方公里，人口三千萬，分八十六個縣，耕地共八千零三十二萬六千九百六十九畝。在二千八百萬農村人口中，農民佔百分之九十。到三月底，全省約有八百六十萬人口的農村，已經完成了或正在進行着沒收和分配地主的土地。

已經完成了土地改革的七個縣包括二百四十七萬人口的農村。這就是河南省中部，京漢鐵路西側的臨汝縣、寶豐縣、襄城縣、魯山縣、郟縣、禹縣和葉縣。這七個縣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度已經徹底消滅，農民成了自己所耕種的土地的主人。據臨汝縣三個鄉和襄城縣三個鄉的一萬五千人口的地區統計：解放以前佔總戶數僅百分之八的地主和富農，佔有六個鄉的土地百分之五十三以上，而佔總戶數百分之六六點六的貧農和赤貧，佔有的土地不到百分之十九。據魯山縣九個鄉二萬多人口的地區統計：解放前佔總戶數百分之一〇點五的地主和富農，佔有百分之五四點二的土地，佔總戶數百分之六一點三的貧農和赤貧，則僅佔有百分之一五點五的土地。又據郟縣十個鄉兩萬多人口的地區統計：解放前百分之九的地主和富農，也佔有十個鄉百分之四十五以上的土地。臨汝縣紙坊鄉的地主們，解放前每人平均佔有二十一點六畝好地，而該鄉貧農和赤貧每人平均只有零點六二畝劣質土地。這些解放以前的土地佔有情況，可以代表上述的七個縣，也可代表河南全省。臨汝等七縣的農民從去年秋收到今年二月底，先後沒收和分配了地主的土地和房屋、耕畜、農具等生產資料。對地主，他們也按人口分給了和他們自己所得的同樣的一份土地和生產資料，讓地主從事農業勞動。現在，臨汝等七縣，貧農、赤貧和地主一樣，每人平均有一畝多到兩畝多土地；中農每人有兩畝左右到三畝多的土地。

現在，河南八十六縣中，還有四十二個縣，有的是全縣、有的是部分地區，農民正在進行着沒收和分配地主的土地。今年六月收割麥子以前，就可全部消滅這四十二縣的封建土地所有制。這些縣實行土地改革之所以可能，是由於解放以來，農民在人民政府和共產黨的領導下已廣泛組織起來，並在反對農村封建壓迫的鬥爭中和減租的鬥爭中取得了在農村中的優勢，並鍛鍊了自己和提高了覺悟。還有三十七個縣的農民，則因組織起來較遲，他們還須在繼續完成反對過去地主當權派的封建壓迫（即「反惡霸」）和減租的鬥爭中進一步地組織起來，團結自己和鍛鍊自己，以準備在今年冬季沒收和分配地主的土地上，完成河南全省土地改革的歷史任務。

解放前，河南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剝削和統治野蠻而殘酷。河南西南部山地中，解放時還存在着中世紀式的地主莊園。堅固城堡裏是地主的高大宅院和倉庫，由幾十個到一百多個莊丁用近代的來復槍甚至機關槍守衛着。臨汝縣大地主閻曰智就是這樣一個地主，他佔有一萬多畝土地，大部分是用武力向農民強佔的。他一生曾屠殺過臨汝縣一千一百多個農民。一九一二年他為兼併土地，血洗了臨汝縣陳岩村，一次殺死農民六百多。這些地主在北洋軍閥統治時代和國民黨統治時代，他們或者本身是官僚或軍閥，或者和官僚、軍閥勾結着。解放前農村裏的政權和武裝，連同打家劫舍的土匪，都是他們的爪牙。

魯山縣永樂庄農民何保全在解放前的遭遇，就是河南農民的一個寫照。何保全今年四十二歲，解放前他作了二十年長工。自己的土地被地主們兼併完了卻租種不來土地，原因是租種地主的地不僅要以百分之七、八十的收穫交租，還得為地主家洗衣、磨麵、担水、看孩子、侍候地主，他家卻缺乏侍候人的勞動力。他一生逃過兩次荒年，父親是餓死的，兩個弟弟和一個女兒是荒年賣了的。這就的解放以前河南農民的命運：他們的土地被兼併，他們被迫作地主的奴隸，忍受重租剝削和壓迫；他們不是被地主殺死就是餓死；他們的家庭則四分五裂，他們的妻女被地主任意姦污。

解放後，河南農民在人民政府和共產黨領導下，展開了和地主階級的鬥爭。還在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八年，解放戰爭在河南省內猛烈進行時，河南部分地區的農民就已經開始組織農民協會，開始了向地主階級的進攻。他們要求反對過去曾殘酷壓迫他們和屠殺他們的地主當權派；要求減輕地租剝削，並進而要求沒收和分配地主的土地。這個河南農民反封建的革命運動在全省大規模地展開，則是在一九四九年八月，河南剿匪勝利取得了農村安定的條件以後。

河南省是在一九四九年春天，人民解放軍南進追殲國民黨匪軍時才全部獲得解放的。而在這時，被人民解放軍擊潰了但還沒有全部肅清的國民黨地方匪軍和原有的土匪，在河南農村中特別是山地中流竄着。少數掌握有武裝的曾經屠殺過農民的大地主，他們害怕農民的正義的膺懲，就和國民黨的特務機關勾結在農村中乘機舉行叛亂。去年，河南省人民政府有力地鎮壓了這個叛亂，並從去年六月開始，在全省農民的援助下進行了大規模的剿匪戰爭。這個戰爭是這樣有力：僅在去年七月、八月兩個月間就消滅了河南農村中所有成股的匪軍；接着在九、十、十一幾個月間，農民起來協助政府捕捉了一切潛藏的匪首，從而在半年間消滅土匪十三萬多，根絕了幾十年以來河南從未肅清過的匪患。剿匪是河南農民起來要求解放所遇到的第一個嚴重的鬥爭。剿匪勝利就為去年下半年河南農民普遍起來反對地主當權派的統治壓迫、實行減租、和進一步實行土地改革奠定了基礎；使河南所進行的這一系列的農村社會改革成為可能。

河南農民從鬥爭中組織起來了。由覺悟的男女貧農、中農和農村知識份子所組成的河南省農民協會，會員已超過四百萬人。從三月十五日到二十一日河南農協召開了全省代表大會，選舉成立了省農協委員會。農協團結了全體農民，團結了農村中的各民主階層，成為農村中人民民主專政的強大基礎。在土地改革已完成了的臨汝等七縣，農協會員則達九十多萬人，佔七縣總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九點四。鬥爭中，河南農民並建立了一支二十二萬六千多人的人民武裝，這就是由人民政府和農協領導的青年農民組成的分散在農村中的民兵，拱衛着農村中的人民民主專政。臨汝等七縣統計有五萬多民兵，掌握着兩萬多支槍。隨着土地改革的完成，臨汝等七縣已普遍以普選方式召開了以農民為主的包括農村中各民主階層的鄉人民代表大會，建立了民選的鄉政委員會。在還沒有完成土地改革的河南其其他農村，農民也已打

（下接第二十二頁）

大生產運動的一個環節

記松江省農村副業生產工作

胡冰

春風吹來，大地解凍。落過幾場雨以後，東北的遼闊原野，已經到了春耕的季節。今年，在東北是展開大生產運動的一年，伴隨着春耕而開始，廣大農村到處都呈現着蓬勃的氣象。在今年的大生產運動中，副業生產是一個重要的環節，各省人民政府，現在都傾注了相當的力量，來搞農村副業生產工作。一兩年以來，松江省的農村副業生產工作比較有成績，最近更有些新的發展。因此，通過松江省農村副業生產的情況，我們不僅可以看到松江省農村的新面貌，而且可以展望到全東北大生產運動的輝煌的遠景。

從全省情況談起

松江省土地的總面積是二六、三二九、七三〇垧，人口有五、三一三、九四七人。在全部土地中，可耕未開地佔五百萬垧，山林佔七百五十萬垧，潮沼地佔一千一百五十萬垧，耕地佔二百二十六萬垧。土改後，耕地面積逐漸擴大，一九四七年是二百〇二萬垧，四八年是二百一十六萬垧，四九年增加到二百二十六萬垧，今年計劃增加為二百三十二萬垧。但是這個數字比起一九四一年的二五四萬垧或四五年的二四八萬垧來，還差很多，因此這兩年內還需要大力開荒，以期超過解放前的耕地面積。

土改以後，農民分到了土地，大家努力生產，發家致富，這幾年來，農民的購買力不斷提高，農產品和工業品的剪刀差價格逐漸縮小。據最近哈爾濱市各縣市場三、四季度總平均價格計算：四七年每噸高粱能換白解放布一・二九疋，四九年則可換到二・五五疋。四七年五斤高粱換一斤鹽，四九年二・五斤高粱就可以換一斤鹽。由於購買力提高，農民生活已日趨富裕。這裏可以舉出一九四九年松江省一個農家的一年收支概算作例子。（計算標準——人口：五人，兩大三小；畜力：一馬；耕地：三垧；勞動力：一個半）

收入的百分比是：

農業生產	67.2%
副業生產	26.5%
秫稭柴草	6.3%

支出的百分比是：

主食	21.8%
飼料	19.2%
副食	13.1%
公糧	11.5%
燃料	8.1%
衣服	5%
副業成本	3.3%
日用雜品	3.4%
種子	3.1%
農具	1.8%

收支相抵後，淨剩純益為10.7%

從前面的數字中，我們不僅可以看到一個普通農家的經濟狀況，而且可以看出副業生產在農家全部收支中所佔的重要地位。如果我們就全省的農業生產情況來加以考查，那麼副業生產的重要性就更加明顯了。松江省今年農業收入如按二、六五四，三七一噸計算，副業收入即合八五四、三七一噸，佔整個農業收入的百分之三十。這八十五萬餘噸糧食，可供全省五百三十萬人吃半年。如果用它買布，可買一、七四三、六〇〇疋布，全省農民平均兩人得一疋。如果買馬，可以買到三九四、二〇〇匹，平均每兩戶得一匹。這些收入，不僅可以發展農村經濟，同時也供應了城市工業原料。副業生產的重要性，於此可見一斑。

去冬副業生產的困難與成績

由於自然條件的優越，松江省農村副業的範圍是很廣泛的：靠山區可以打圍、採伐、製農具、採山貨；靠水區可以打魚、織蓆、編鞋、打草；平原區可以賣柴、拉腳，編筐，紡織。此外如養雞、養豬、養兎等，也都很有發展的前途。不過因為氣候比較寒冷，冬季期間較長，所以農民們主要是在冬閒期間，進行副業生產工作。去年冬季組織副業生產時，曾經發生過一些困難。主要的縣群衆對副業認識不夠，熱情不高。有些人認為「沒啥搞的」，有的人存着「硬挺」思想。阿城縣老營村關滿升，糧食夠吃到今年六月，甜菜也有指望，因此打完場就每天喝燒酒，啥也不幹。其次，有些地方在生產中存在着無組織、放任自流的現象，有些地方則是強迫命令，盲目生產。如賓縣變嶺村群衆，割了兩萬多斤苕條，結果賣不出去。此外：城鄉供需缺乏聯繫，生產品找不到銷路；不熟悉生產方法，技術不普及；困難戶沒有本錢，想搞也搞不了等等，也都是問題。

省人民政府了解到這些情況以後，馬上設法解決。首先通過各地人民代表會議和公民小組會，用「算細賬」的方式打通群衆思想，幫助生產小組訂計劃，組織起來實行互助合作，提高了生產效率。雙發屯的陳永奎，編筐子，以前一個人幹，每天只能編兩個筐，組織起來以後，兩個生手時候，他一個人編，每天能編六、七個，而且教會了兩個生手。在生產中，黨員幹部起了帶頭作用，各地都組織了副業生產委員會，調查具體情況，給生產品找銷路。同時組織有生產經驗的人，教給群衆生產方法。各地銀行通過合作社對困難戶發放了副業貸款。東北銀行佳木斯分行，曾貸給樺川縣組織上山的獵戶三十人每人三百萬元，解決了食糧和棉衣的困難。為了保證副業生產品的合理推銷，各地副業生產委員會，都跟國營企業訂立了推銷合同。各國營商店，則通過合作社收購產品。

由於這些困難獲得解決，松江省去年冬季的農村副業生產工作，得到了很好的成績。這裏可以舉出兩個比較典型的例子：

一、湯原縣農民，在去年冬季（秋收後到十二月，約兩個月間）經營了採伐、拉腳、打皮子、打魚、打柴等副業生產，動員勞動力一〇、九七五人（佔全縣勞動力65%）畜力六、八三五匹（佔全縣能用畜力65%）共收入東北幣三百八十六億元，補助了去年冬天的棉衣問題和今年春耕生產上的困難。他們還計劃在今年一月到三月間，再收入一倍，以補助今年夏鋤期間的需要。像這樣做，就是在實際上幫助了四九年的災荒問題和五〇年大生產的實現。

二、密山縣裴德區，在去冬兩個月間，拉坑木一、八三一米，打皮子五百餘張，共收入十八億八千萬元。他們把這筆款用在克服生產困難和擴大生產方面，共買膠皮車六台，三輪車十二台，二輪車四十四台，牛十四頭，馬三十七匹，食糧二百五十石，冬衣一百一十套，靰鞡一百雙，豆餅兩萬二千斤，大頭鞋二百二十五雙，食鹽兩萬一千五百斤，另外沿修理了三十五輛車。

為今年的生產任務而奮鬥！

今年全省的生產任務，在農業方面要求在現有耕地上精耕細作，推廣使用改良農具，提高常年產量9%，並且要擴大開荒五萬九千垧（內水田五千垧）。在副業方面，今年仍然以組織冬夏採伐為主，其次提倡打魚、打圍、家庭

（下接第二頁）

上海的自然科學工作者掌握了新方向

左步青

（一）沐浴在毛澤東時代的光彩裏

中國的自然科學，到「五四」運動時纔受到社會的重視，但是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以及封建意識和帝國主義勢力雙重的桎梏和迫害，中國的科學事業及其成員一般說來是比較落後幼稚的。一般科學工作者因為他們所屬的階層和所受的教育，以及社會環境所給予的影響，使他們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歐美式的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傾向，往往易於把科學事業理解為超現實超政治的性質，以為學院式的閉門造車的研究作風，就是真正從事科學的工作精神，而很少理解社會經濟結構是科學發展的物質基礎，也很少去調查研究中國廣大人民對科學的要求以及中國勞動人民多少年來創造的技術積累。

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上海分會在去年未解放時舉行的第一屆年會就強調指出：一般的科學工作者具有一些知識分子所具有驕矜與孤芳自賞的態度，逃避與厭惡集體生活，甚至在工作和生活圈內，過分重視自己的意見與自創的作風，遠離人民大衆，從事科學工作的兄弟之間也要鬧派系，一盤散沙，毫無力量，因此，使中國的科學事業有了牛步化甚至停滯不前的現象。

然而，歷史在創進，沐浴在毛澤東年代的光彩裏，新中國的各方面都有了新的轉機，科學工作者們可以自由從事自己的事業，應該刻不容緩地把握時機，除加強自己崗位上現有的科學工作外，還要自覺地、澈底地、把自己的思想提高，配合着歷史的方向，建立新的宇宙觀和人生觀，團結所有從事科學工作的人們，進行即將展開的科學建設事業的研討與計劃，和全國人民站在一起，為建立並保衛人民祖國的科學事業而努力。

基於以上所說，時代需要科學工作者們努力，在一個嶄新的社會中科學也受到普遍的重視。共同綱領中文教政策內，對科學事業列有專條，人民政協開幕，出席代表十七人。科學工作者有了全國性統一領導機構——中華全國自然科學者第一次代表大會籌備會，各地設有分會。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下，有中國科學院和文化部的科學普及局等機構，對今後中國科學事業的發展，構成極有利的條件。

上海方面：有中國科學院華東辦事處所屬前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科代上海分會、科協上海分會、上海科學技術團體聯合會、中國科學社、中華自然科學社、中農、中醫、物理、電機、工程、化學、生物、米丘林學會等及大專院校、企業單位、農場、政府機構中自然科學工作者，據最初統計約五萬餘人，在科代上海分會登記者已有一萬餘人，分在理、工、農、醫四部門工作。（按：登記工作從去年十一月開始，尚在繼續進行）

（二）參加各種社會活動

去年五月二十五日上海解放，這是一個令人難忘的日子，迎接解放的陽光，各科學團體紛紛發表宣言，六月五日，成立了上海科學團體聯合會；六月六日，中國工程師學會在暨南大學舉行慶祝解放後的第一次工程師節，出席茅以昇、趙祖康、支秉淵等三百餘人，沙千里、夏衍都出席講話，號召「建設新中國的工業，團結更多的科學工作者，為人民服務。」

六月十二日，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上海分會舉行臨時全體大會，這是一個比較年青活潑的團體，過去反動統治時遭受種種迫害，會友鍾泉周任職公共交通公司，和王元、顧伯康烈士同遭殺害，這次會上，裘維裕老教授說：「我們要為完成他的遺志前進。」陳市長也應邀演說。

同時，吳有訓、竺可楨、茅以昇等搜集了上海方面關於全國性科學會議的意見，北上參加籌備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工作，這是全國科學工作者團結與會師的大典。

六月二十六日，山東考察團出發，全團三十六人，分機械、化工、電力、輕金屬、煤礦、農業六組。

七月間，本滬展開熱烈勞軍，科學技術界也展開慰問，八月十四日，數千人在暨南大學集會，贈送戰士們科學雜誌書籍及其他慰勞品，陳市長親自蒞會表示感謝。

響應政府六大任務的號召，科技界開始動員人才到山東、東北等地從事建設工作，科協、技協、中農三團體舉辦人才登記，經過幾次歡送會和請人演講東北、山東建設情況，直到目前為止，仍在繼續進行。

八月底，中華全國第一次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大會上海籌備分會着手籌備，九月三日在前中央研究院開成立大會，選舉常委五十三人。成立後第二天，科代舉行自由座談會，出席科學界知名之士百餘人，痛斥美帝之侵略本質和民主個人主義的危害性，科學工作者已有了明確的立場。就在這時候，電訊報導：英國著名物理學家、世界科學工作者協會副主席貝爾納教授，因為在全蘇擁護和平大會上，發言揭穿英美科學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好戰目的，被英國科學促進會無理地開除會籍，這是帝國主義者又一次對進步科學工作者的迫害，上海的科學工作者對這次英國科學促進會的迫害行為表示萬分憤慨與強烈的抗議，同時對貝爾納教授的受迫害致以深切的慰問。去年年底，上海各階層人民紛紛學習人民憲章時，科代也舉辦了一系列的講座，並舉行了「自然科學與辯證法」的座談會。第二屆上海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開幕，科學技術界有十六位代表出席，在科學工作者新年聯歡大會上，吳學周（前中研院化學所所長）作傳達報告，他說：「我們自然科學工作者，在過去除掉本位的工作而外，以為外事是不無關聯的，……現在的上海各界代表會議，我們的感覺和印象正和以往相反，是十分愉快、興奮。」聽了他的話以後，誰還認為中國的科學工作者是超政治的呢？

「二六」轟炸以後，上海人民開始反轟炸的艱苦鬥爭，科學技術界立刻成立了反轟炸工作委員會，請專家編印了防空手冊，並出動工作隊深入工廠里弄，宣傳有關防空的如消防、救護常識，收到很好的效果。

到今年三月間，中國科學院華東辦事處成立，接管前中央研究院在滬各研究所；四月，科學院副院長李四光先生返國抵滬，一連串的事實雄辯地說明科學事業在新中國的確是被人尊敬而不再是點綴了。

這裏還要特別提出的是上海自然科學工作者所做的空前規模的大事，一次是華東農展，一次是下鄉治療住血吸蟲病。

（三）下鄉治療和華東農展

去年年底，市郊區流行的日本住血吸蟲病

（下接第二頁）

李四光教授及其在地質學上的成就

徐盈

在蘇聯影片密邱林和巴甫洛夫等偉大史劇中，我們都會看到各帝國主義者是在設法把新興國家中的老科學家誘離祖國，以達到他們的政治陰謀。在上述兩片中，這兩位老科學家都在怒斥帝國主義者的走狗，說明一個有成就的科學工作者，是不會離開人民的祖國的；這情景，令人十分振奮。

今天，我們應以同樣振奮的心情，來歡迎數學家華羅庚教授及地質學家李四光教授的歸國，由於他們的號召，可能使在國外苟且生活下去的科學工作者們驚覺，早日返國，從事新民主主義新中國的偉大建設。

李四光教授的影響，在中國地質學界已有了定評，同時他也是一個備具了革命精神的人，他的治學及作人，也都有其卓然不群的地方。他幾乎是以自然辯證法的方法來處理地殼的變動現象。在翁文灝等人硬說中國地史上沒有冰川遺跡時，李四光在廬山發現了冰川的材料（以後又在貴州發現了），這樣便推翻了中國地質史上的傳統說法，而起了一個空前未有的論辯。他從來不孤立地看問題，他曾這樣公開說過：

「世界之中有中國，中國之中有世界。

「解決一個科學問題，不能自本身來作解決，必須涉及其他科學結果聯合而成。

「不要鑽牛角尖，要多作橫的聯繫。」

一八八九年李四光教授在湖北黃岡縣降生。十四歲被官費送到日本留學學習造船的時候，他就參加了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革命運動。回國在武昌教書，滿清推翻，他不願就教育廳長，却請求到國外讀書。一九一六年在英國伯明罕大學，他在表面上是學文學，但對數學、物理，特別是地質，發生了興趣，在幾位名師指導下大有成就。（如 W.S. Boulton 和 C.Lapworth 都是當時的地質學權威）後來又到大陸上的法德去研究，一九二〇年，他應北大校長蔡元培的邀請回國任教，次年成立了地質調查機構，開始了逐步培養學生及重點的地質調查。

用了十五年的時間，他自己和他的學生們研究中國地勢的變遷及地質構造的變化。他到了前中央研究院任地質研究所所長，武漢大學教授，代表中國出席世界地質學會議。一九三五至三六年，他被英國聘為交換教授到倫敦講學，以講稿寫成一書，名為「中國地質」。由於他精研大同、黃山、及廬山的地質，發現冰川現象，一九三七年著有專文發表。抗戰時期，他在華南領導中研院地質研究所同人在積極工作，一九四七年發表地球地理學，創造了不少對這個研究的基本法則，在數學上也有其極高的成功。

抗戰勝利之前，李四光教授到重慶講授「地球物理」，當時的新華日報曾用極大的篇幅刊載着他們自己的特寫，表示對這位辛勤的學者的尊敬。李四光教授把地殼喻為比雞蛋皮還要薄的一層表皮，上面的山和水，因浸蝕而造成了皺摺。地球只是冷到二百尺；六百尺以下，即沒有冷過；每深一百尺（三三公尺）即增加攝氏一度。我們對於地球物理的知識，正在逐步擴大中。

李四光教授拿出了一塊像手杖柄的石頭，那是他在樹林發現的，他非常珍貴這一發現，由此證明了理論的正確。他將石頭比作麥芽糖，又堅固又是液體。液體是在變動中，有半延性，有半塑性，一方面在橫流，一方面在縱流。經過了很長的時間，受了壓力，自動地屈折了過來，以此「小小石頭，說明宇宙」，地球上的皺摺，山川起伏，是這樣來的，這是「動」的說明，不是習俗的那一套舊理論。他在治學的步驟上是極小心的，他說：

「事實是一種結果，但要因斯坦說，根據事實得不出結果，作為科學的工作者，本身不能成為一張白紙，他要有選擇的認識，不合用的見解要不得，每步都要站穩，然後再走。」

一九四八年又代表中國赴倫敦出席國際地質學會第十八屆年會，那一年他六十整壽，他的學生們以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叢刊第八號為他出刊了一厚冊「李四光教授六旬壽辰紀念冊」，文章二十多篇，共計三百三十九頁。多半是在西南及中南的工作結果，一部門是為了抗戰時期特重的礦產調查。由此可以說明了中國地質學界，在工作崗位的具體的表現，作為推頌李四光教授領導的成就的一個光炬。

李四光教授因為心臟衰弱，他便留在英國。這兩年中，中國有了基本上的變化。去年中國人民政協代表名單裏有他，跟着中央人民政府又發表了任他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而李氏在旅歐期間，目睹在帝國主義迫害下的科學工作者隨地都遭受限制，甚至陷入恐怖，也更增加了早日返國的決心。他的學生，他的故舊，以及熟知他的一切人們早已向他招手：早一點回來吧，可愛的學者，中國的大地質學家！

據說本年四月，解放軍渡過長江的時期，他就要啓程返國，因為種種波折，未能實現。到了人民政協名單發表，蔣匪帮命令偽駐英大使館，要他發表聲明加以否認。李四光教授為了愛祖國、愛科學、愛人民，以長期潛伏着的革命情感，接受了祖國熱烈的呼喚，留函毅然拒絕了匪帮的陰謀，暫別了尚留在英國的夫人，當日出走瑞士，等他的夫人也趕到後，便乘貨船轉道意大利、馬尼剌等地到香港。在香港完成為他的老友印度古植物學權威沙尼氏所寫的紀念論文，便投入祖國的懷抱，在一九五〇年四月初，他自廣州乘火車到了上海，受到科學界的盛大歡迎。

「在美國和西歐，科學研究的成果被迫用在製造大規模毀滅人類的武裝上，這不是科學本身的錯誤，而是反動的、沒落的社會政治經濟制度造成的惡果。」

李四光教授在上海第一次科學座談會上這樣說。他批評了「為學術而學術」「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等過去的錯誤觀點，惟有為全人類謀幸福纔是科學家正確的道路，他指出科學家只有兩條路，一條是為人類謀幸福的路，一條是替「吃人生番」作幫兇。科學家沒有第三條路可言。

他帶來了帝國主義者正在以大部人力財力從事自尋毀滅的戰爭的消息。在隨着美帝國主義的馬歇爾計劃和大西洋公約俱來的控制歐洲人民的工具，是帶有毒素的學術文化和思想。戰後，進一向標榜着所謂「學術尊嚴」的洛氏基金會成為籠絡收買歐洲各國科學家的工具。曾經標仰着超階級超政治的西歐學院派學者們，過去痛恨納粹的專制殘暴，幻想着美國有安定的環境，良好的設備，充沛的財力，如今卻不能逃避現實的考驗。一部分學家，利用從事製造毀滅人類的工具。

叫囂戰爭的軍閥和財閥們，為了防止被迫從事的一部分科學家洩露秘密，把每一個部門都孤立起來，使他們不能瞭解整個陰謀計劃。但是一個完整的工作分工製造了，最後還得要有極少數人把它綜合起來，如果綜合這些殺人武器的人也洩露了秘密呢？

（下接第十八頁）

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報紙雜誌通訊社臨時登記證新字一〇五號
華北郵政總局登記認為第一類新聞紙類登記證第八一號
華東郵政總局登記認為第一類新聞紙上海郵管局登記證第六五號

每冊售貳千伍百元 （京）